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如何正常，怎樣國家？—走進石原慎太郎的國族敘事

Japan's Quest of Normal Statehood:

Ishihara Shintaro's Writings on Nationalism

莊雅涵

Ya-Han Chuang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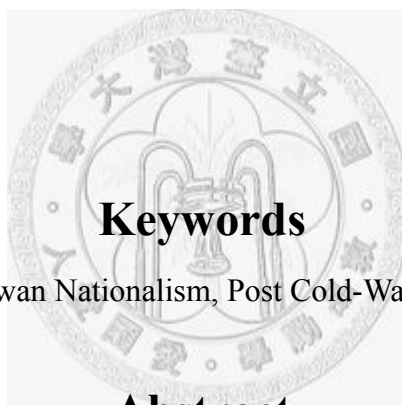


## 中文關鍵字

石原慎太郎，台灣國族主義，後冷戰，日本，東亞，中國威脅論

## 中文摘要

本文以石原慎太郎的生平經歷和政治主張為分離點，討論三個問題：他對中國、美國的態度如何形成、關懷為何，他的民族主義語言如何被中國與台灣的知識界批判或挪用，這些論述又有哪些貢獻與侷限。透過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本文也企圖勾勒出日本右翼國族主義與台灣獨立思潮之間的聯繫，指出他們在批判、疏遠中國的同時往往對自由主義霸權缺乏反省，封鎖了針對共同歷史經驗對話、理解的空間，因此建議揚棄以國家為中心的發言立場，來重建理解東亞歷史的視野。



### Keywords

Ishihara Shintaro, Taiwan Nationalism, Post Cold-War, Japan, China Threat

### 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se the political narration of Ishihara Shintaro and its influence. By firstly contextualizing his critiques on China and his vigilance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in Japan's post-war history and then presenting the response from Chinese and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I argue that both the discourses "for" and "against" discourses have their shortcomings and are lack of insight to criticize the hegemonic, American-centered epistemology which despises China. To build up a platform of peaceful dialogue,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East-Asian history and transcend the nation-centered epistemology beneath Ishihara's narration.

## 謝辭

在台大政治系所八年的成年時光就要隨著論文的出版畫下句點，在落筆的此刻仍難覺真實。關於本論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石之瑜教授的指導和兩位口試委員的叮嚀與指正；其次感謝彭榮次董事長、陳鵬仁教授慨然接受專訪分享他們與石原知事相處的經驗與心得；季陽、明蓉協助翻譯石原的文章，更是本論文得以寫作面世的重要推手。

求學過程中諸多師長的啓迪，使我在漫漫學海中處處有明燈與榜樣。歷歷在目的是：黃長玲老師對研究方法的嚴謹要求和對社會改造的熱情，朱雲漢老師妙語如珠的課堂舉例，林俊宏老師悠遊於古籍經典中的瀟灑，蕭全政老師「作學問不可以像水晶球，不採取立場」的提醒，江宜樺老師致力探求、追索各種思想源頭的孜孜不倦，葉啓政老師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深刻反省，錢永祥老師對各種討論質疑保持開放的胸懷；致力於「鑿開霸權」的石之瑜教授不僅擔任論文指導，在我情緒低落時更不吝包容，我和所有修習《中國大陸研究方法專題》的同學都會對這段互相扶持、惕勵的時光充滿感激與回味。

論文寫作過程中還承受許多好友的情緒支持，感謝書嫻、佳蓉、國棟、惟方、景祥、亞宜、夏琳、敬雯、靜旻、欣怡給我最充分的聆聽與陪伴，有友如斯是一生的福氣；奕婷、經懋、偉立、思宏在我需要討論時隨時交換意見；哲思坊的彥斌、坤龍學長是我的讀書會啓蒙，少了他們我的大學生涯可能會是另一個模樣；柏謙、柏儀、書涵、中睿、俊達等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伙伴們的耍寶；還有台大心理輔導室林雪琴老師長達一年多的晤談分析，協助我釐清自己的長處與盲點，堪稱一生的貴人。

在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工作的時間是我人生中成長最快、自我發揮最充分的時期，感謝 Jan 與淑芬姐在各方面予我的教導、賞識與榜樣。父母親從小在教育上的投資亦是支持我走到這一步的關鍵，這本論文必然是獻給他們的。

#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	5
第一節：研究動機 .....	5
第二節：一位保守主義者的畫像——石原慎太郎生平簡述 .....	7
第三節：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 .....	9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章節設計 .....	17
第二章：文學家石原與戰後日本的曖昧 .....	20
第一節：「太陽王」的誕生 .....	20
第二節 從政之路 .....	27
小結 .....	36
第三章 政治家石原與冷戰後日本的歐亞游移 .....	38
第一節：從退出中國到中國威脅論：近代日本的大國路 .....	38
第二節：為何說 No?向誰說 No?—石原慎太郎的日美關係觀 .....	43
第三節：永遠的「惡鄰」—石原慎太郎眼中的中國 .....	47
小結 .....	55
第四章 從日本面對中國：海峽兩岸的石原情結 .....	58
第一節：異口同聲齊說「No」：海峽兩岸對石原的挪用 .....	58
第二節：戰後台灣的知識氣候—從自由中國到民主台灣 .....	63
第三節：向石原說「YES」？—台灣菁英與石原的交會 .....	69

小結 .....74

第五章 結語：愛國的限度？ .....78

參考文獻 .....83



# 第一章 導論

「拒絕遺產的姿態本身乃是遺產的俘虜。」

—竹內好

「在有色人種當中，只有日本完成的近代國家的成立，曾經毅然予以支撐從前明治的人們。福澤諭吉為了表明明治人們的勇氣曾說的：『無獨立之心者，思國豈能深切。立國非公，是私也。』這句雄渾的話，我們應該再為自己把它取回。」

—石原慎太郎



## 第一節、研究動機

1999年4月11日，東亞各國報紙都以顯著篇幅與審慎語調報導了新任東京都知事選舉結果——香港文匯報指出：「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市長，將挑戰小淵外交政策」；台灣中央日報則稱「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日本選民向右急轉彎」，讀賣新聞與每日產經新聞亦憂心忡忡地分析石原當選對首都與中央關係的衝擊和國際觀感。在這場號稱「史上最激烈」的東京都首長選舉中，素以強硬、直言、鷹派色彩鮮明著稱的石原慎太郎以超黨派之姿獲得了壓倒性勝利，文學家石原自此真正變身為坐擁雄厚民意基礎的政治家石原；而不僅僅一百六十多萬支持他的東京選民拭目以待「東京可以說NO！」<sup>1</sup>的具體表現，對半世紀前深陷同一段歷史漩渦中的中國與台灣而言，石原的崛起更掀開了潘朵拉之盒，促進著人們撥開陳年的塵埃，將記憶與愛憎一併說個明白。

台灣與中國看待石原慎太郎的複雜情緒，由其當選後的媒體報導可見一斑：

<sup>1</sup> 石原慎太郎競選東京知事時的口號。

台灣媒體除了強調石原的右派立場之外，皆不忘提及石原「對台灣友好」、「曾允諾邀請李總統訪日」(陳世昌 1999)，呼應著李登輝任內積極建構台獨論述基礎、尋求重新詮釋台日關係的氛圍；相較於此，中國大陸對石原的批判卻是不假辭色，稱呼石原為「為軍國主義瘋狂招魂的人」、「中日關係的雜音」<sup>2</sup>等等，還未待到石原正式就任市長，各方便隔著兩國媒體唇槍舌戰<sup>3</sup>，就任之後，從不遮掩自己親台、反中立場的石原知事，果然以外交上的各種大動作頻頻挑撥中一日一台灣關係的敏感神經。事實上，早在石原激起台灣與中國的矛盾反應之前，他便憑著兩本勇敢說” No”的小書單挑美國，博得了” Dr. No”的謔稱。

面對一位大言不慚「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的虛構！」，並動輒鼓吹「要使日本挺起腰桿、作政治經濟大國」的民族主義政治家，站在反壓迫反殖民的立場對其提出批判似乎是再正當不過的了。然而當這樣一位政治家在四年後囊括七成得票光榮連任，而反觀台灣各界，仍為了李登輝領導的在野黨該不該赴東京參拜靖國神社爭論不休；顯然，清算戰爭責任並非有效的歷史解釋方式，不足以產生令人滿足的相互定位。至此，石原「強硬右翼」的標籤蒙上某種不透明性，敦促觀察家回溯日本戰後歷史中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遺緒，重新認識石原慎太郎與其所座落的政治光譜。

誠如許許多多學者已意識到的，對於日本殖民歷史的詮釋是台灣當今統獨意識角力的「潛文本」(方孝謙 2001，荆子馨 2006)，今日台灣人夾處在「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之間的認同角力，皆來自於殖民解除後未善被清理的困惑。如欲梳理這些千絲萬縷的曖昧，必須以同情性的理解進入日本的國族主義意識型態乃是必須。本書的目標便是將石原慎太郎作為一個多稜鏡，藉由貫時性地整理其國際關係觀點，一面層層探勘日本右派的國家主義系譜，一面對照台灣、中國和西方各界對他的褒貶，以容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愛憎兩難相互呈現。

<sup>2</sup> 聯合報 1999/04/15；1999/04/16，香港文匯報「石原慎太郎 中日關係雜音」。

<sup>3</sup> 為了反擊中共外交部稱他為「中日關係雜音」，石原慎太郎立刻指摘中共「反人權」是「帝國主義」，見陳世昌 1999b。



## 第二節、一位保守主義者的畫像——石原慎太郎生平簡述

石原慎太郎出生於 1932 年，22 歲在一橋大學就讀時以中篇小說《太陽的季節》獲得當年的芥川文學獎，故事描寫一群年輕人在親密關係中的迷惑：拳擊手龍哉與少女英子相戀，年青的他無法捉摸心中情感，先與兄長打賭將戀人「讓」給哥哥，與女友修好後卻發現其懷孕，左右為難之下還是要求英子墮胎，卻以手術失敗、英子併發腹膜炎死亡作結；整篇小說圍繞著男主角龍哉迷惘的內心世界，他從未考慮過英子的需求，即使在戀人的喪禮上面對其親人責難時，他心中的獨白仍是「這一切你們都不會瞭解的！」這部一鳴驚人的作品造成複雜的社會效應：一方面許多衛道人士為作品中的「敗德」情節驚駭不已，認為這是芥川獎的「恥辱」（謝志宇 2005:232），另一方面，與石原年齡相仿的青年們卻認為作品精準地描繪了在戰敗歲月中成長一代的不安與虛無，並奉之為戰後第二代小說的代表。作品拍成電影後十分賣座，使飾演男主角的慎太郎之弟——石原裕次郎——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sup>4</sup>，更吸引許多青年模仿片中人物的造型與生活態度，創造出「太陽族」的頹廢次文化。

1968 年石原慎太郎以三十六歲的才俊之姿正式進入國會，二十多年議會生涯中陸續擔任運輸大臣、環境內閣大臣等職位，並幾度被看好為首相接班人。1989 年他與 SONY 總裁盛田昭夫合出了小書《可以說 No 的日本》，鼓吹日本亟需一場「精神革命」，以掙脫被美國保護輕視的過去，同時向美國的干涉說「No!」。該書在日本瘋狂大賣兩百萬冊，一時間洛陽紙貴，並譯成英文發行；隨後陸續出版的評論集《仍然應該說 No 的日本》、《日本堅決說不——戰後美日關係總結》，忠實地繼承日本右翼思想，左打美國擴張侵略、右批中國傷害人權，主張日本是二次大戰的「受害者」，否認南京大屠殺為中國所虛構，進而要日本人從戰敗的屈辱與原罪意識中解放，挺胸抬頭成為一級強國。1995 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之際，

<sup>4</sup> 裕次郎在日本受到的歡迎絕不亞於石原慎太郎，在石原政治生涯的初期，弟弟裕次郎也曾為他在選區內走透透，以致於在開票時竟然開出寫著「石原裕次郎」的選票（石原慎太郎 2006:51）。1999 年石原慎太郎競選東京知事時，更是不時要以「我是石原裕次郎的哥哥」來自我介紹。

石原又與印尼總理馬哈地共同出版了《亞洲可以說 NO!》，認為亞洲的經濟受到美國過度干預及剝削，應該團結組成以日本為圓心的亞洲共同體。不論現實政治如何波動，石原在國際關係上的立場始終不脫素樸的日本中心主義；選上東京都知事後他的公開發言更是百無禁忌，不但針對中一日一台灣關係的發言和定期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動時常觸怒中國，針對婦女、同性戀、在日移民的歧視性發言也屢屢引來國內抗議<sup>5</sup>，然而石原知事甚少道歉。儘管語不驚人死不休，細究石原的發言基調，貫穿他各種看似挑釁大膽言論的是某種古典保守主義：對共同體的忠貞捍衛、對傳統思想和集體主義價值的維護，貫穿了他的種種言論，縱使是受到兩極評價的小說作品，也多以一種純正的寫實現代主義筆法，呈現個體在新舊時代溝縫之間的徬徨掙扎<sup>6</sup>。

但如何評判一位保守主義者並不是本書所關心的課題。作為一位說故事的人，本書的動機在於勾勒個人與時代精神結構的互動及意義產出，而石原之言行最令外界困惑之處，恰恰來自他對共同體的無條件忠誠、吹捧，在於他不合時宜的懷舊及渴望改寫歷史的衝動。本書順著諸多研究者的思考脈絡——當西方現代性以普遍主義的敘事型態進入亞洲世界，被貶為「落後」範疇的東亞諸國為回應此壓力，乃焦慮地擁抱某種被神聖化的國家主權敘事，透過國家疆界的明確化來劃分自我與異己，方能抗拒被否認，又或指控他人為帝國/霸權/殖民者的範疇；換句話說，「國家」因而成為亞洲民族遮蔽創傷的戀物替代對象，在汲汲追求現代國家形式的過程中，對內、對外都誘發了更紛繁的暴力形式(劉紀蕙

2004, Shih 2003, 子安宣邦 2003)。——由此提問：石原的右翼立場具有怎麼樣的歷史含蘊？在其圖像中的東與西、中國與台灣、乃至於日本與亞洲的關係，如

<sup>5</sup> 如 2000 年 4 月間在公開場合指東京地區應慎防「非法入境的三國人犯罪」，雖曾發表書面聲明道歉，2003 年 4 月與 2006 年 9 月間仍再次發生類似發言，引起聯合國「人種歧視排除委員會」關注；2001 年 11 月接受雜誌專訪時指「失去生殖能力的女性是無用之物」而遭到婦女團體控告，要求賠償精神損害並登廣告道歉，兩度審判都判原告勝訴；2000 年七八月間則陸續發言指同性戀為「異常」且「落後」，且在東京都促進人權綱領中刪除對於同性戀的保障條款；2004 年又公開指「我不得不說法語沒有資格成為國際性語言，因為它不能數數」而被 21 名在日本的法語教師告上法庭要求賠償。

<sup>6</sup> 文學批評家 Ann Sherif 則認為石原小說中的暴力美學與他的政治發言表現出一種「創新的男性特質」(renewed masculinity)，而此種保守主義正是 1955 年日本自民黨體制成形後時代氛圍的產反映(2005:189)。她的論點在第二章探討石原的早期作品時將有進一步闡述。

何與日本和亞洲的近代史發生聯繫？而台灣與中國面對石原的國族敘事時的各種反應，又透射出東亞「啓蒙計畫」中的哪些衝動與創傷呢？

進入細部的討論之前，先由幾個關鍵詞彙出發，回顧學者們對重要歷史事件與概念的探索。

### 第三節、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

#### 壹、日本－現代性－亞細亞

自 1853 年黑船事件迫使日本面向西方之後，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始終伴隨著對自身與歐洲、「亞洲」關係的思索。福澤諭吉鼓吹日本「脫亞入歐」全盤西化，希冀接受了線性史觀的日本從此將自我定位為進步西洋的一員，在政治上透過神話的流傳、國語運動的推行和武力統一打造民族國家 (小森陽一：2003)；在文化上則引進實證史學，以科學史觀來書寫日本國史、汲汲擺脫臣屬於中國，或其所主導的亞洲秩序的東洋歷史敘事 (Tanaka:1993)。

Steven Tanaka 和子安宣邦 (2004) 從不同維度描繪日本在二次大戰前「脫亞入歐」的軌跡：Tanaka 受到 Edward Said 理論的啓發，分析白鳥庫吉和其所帶領的東京學派怎樣透過漢學的革新、「支那」範疇的創造、與客觀化史學原則的引用，一步步將日本的歷史從中國與其所象徵的亞洲文明中剝離，如此，日本不但透過史觀重構習得了西方文明的能動性，更進一步模仿其主/客對立的認識論，將中國建構為被動的知識對象，從而合理化日後軍國主義將亞洲視為侵略對象的意識型態。子安宣邦則指出，亞洲從 1850 年歐美東進開埠後便被捲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史，而日本既已接受普遍主義的認識論和進步史觀，便以侵略、擴張為現代國家唯一的生存手段，於是透過參與一次世界大戰要求重組大寫的「世界」秩序、渴望進入現代帝國之列，終於在面對亞洲時徹底複製了西歐國家的認識圖式而走上了帝國侵略之路 (2004:6f)。不論是消滅漢字以建立純淨日本國語，或是建

構客觀史學鞏固日本的主體位置，中國是無所不在的他者：唯有解構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日本方能名正言順地進入現代歐洲文明 (2004:80)。

中國學者王屏 (2004) 則以「亞細亞主義」概念涵括明治維新至二次大戰期間 (1898-1945) 日本知識界到政治人物關於亞洲的論述。她認為，這段時間裡日本對於亞洲的看法經歷了三階段轉變：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仍抱有亞洲是「命運共同體」的平等合作想法，她稱之為素樸而古典的亞細亞主義；甲午戰爭以及侵韓成功後，亞細亞連帶主義的思維被擴張主義取代，亞洲各國在日本眼中由平等合作的夥伴矮化為併吞統治的地域，終於隨著「大東亞共榮圈」口號喊出而被對象化為侵吞剝削的戰略目標，「興亞」的思想也被「侵亞」的戰略方針吞噬。儘管鉅細靡遺地記錄了明治維新後日本外交意識的質變，王屏始終無法有力解釋這一系列現象之下的內在動因，無法回答為何在日本近代政治發展史上岡倉天心的人道關懷會不敵侵略主義的野火；也自然無法看出岡倉與軍國主義分享了類似的歷史使命，亦即：證明日本是比西洋更具普遍性的文明典範。自白鳥庫吉以降，這個歷史使命便一直驅策著日本知識界與政界。

其實，如何理解現代性，又如何在其中置放「日本」和「亞洲」，正是戰後困擾著無數日本知識份子的關鍵。政治學家丸山真男在戰後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認為日本受到天皇制國家觀的箝制，由上而下發動西化，現代性於是被膚淺為國家機器的理性化，卻缺少了國民精神的解放，無法形成如西歐資產階級般自主、批判的公民社會，於是乃以封建帝國主義的形式迸發暴力向外擴散（子安宣邦 2004:256；孫政 2005:139）。丸山很顯然地將歐洲的現代化經驗作為一種理念型 (Ideal Type) 來檢視日本的異域實踐，在批判日本只有肉體的、皮毛的模仿，而無從構築具主體自決意識的政治權力時，他儼然以為啓蒙計畫應該具有自我矯正以抵抗法西斯的力量；這類對現代性的認識，相較於戰前京都學派的「世界史立場」，就算對於軍國主義的態度迥異，也都承認某種具有普遍真理性質的啓蒙現代性。但當京都學派在戰前號召突破歐洲而邁向整體的一，並且宣示「我們

就是近代自身！」以合理化軍國侵略時，丸山所揭示的「未成熟的近代性思維」，卻恰是對京都派學者們以抽象邏輯粉飾侵略犯行的嘲諷，指責他們對暴力的附和正是日本國民幼稚並缺乏批判性的表徵 (子安宣邦 2004:222-256)。

不同於丸山站在日本經驗的外部觀察，竹內好苦苦思索一種內在於日本經驗的抵抗之道。在 1948 年發表的〈何謂近代？〉一文中，他將「近代」視為歐洲歷史經驗中的獨特過程，這樣一種經驗帶來各種矛盾與抵抗，包括作為變形的美國，也包括俄國在失敗經驗中淬煉的精神遺產。他進一步主張，作為近代西洋之反題的東洋，亦要在反覆失敗的抵抗中發現自我的主體性；然而在「優等生文化」驅使下，戰後的日本所選擇的是遺忘失敗與恥辱，無法理解失敗的日本於是也無法辨認當初是如何從「近代的超克」之中敗退，如何被虛假的神話推入法西斯總體戰役，而反省之無能終使得類似的困惑一再回歸 (2005:357)。在 1960 年題為「作為方法的亞洲」演講之中，他對比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經驗，認為中國在近代化道路上雖挫折不斷，但始終是出於自我要求進行改革，是充滿主體性的發揮；相形之下，日本一味幻想變成歐洲而拒絕承認失敗，反而一再墜入當初失足處。故日本若要建立主體性，就應該擺脫對歐洲的崇拜，回到亞洲的認同之中體驗抵抗。於是「亞洲」在此意義上不再僅僅是地域或文明的象徵，更是作為現代性思維的反題，也就是某種不具備固定內涵的「非歐洲」性質。

竹內好對於日本缺乏反省的憂慮，又和子安宣邦 (Ibid) 的觀察不謀而合。二次大戰後的「無條件投降」使日本在受害者意識中喪失了反省的能力，加以冷戰期間日本被編入美國圍堵線，不但戰爭的意義和走入法西斯的原因無暇得到適當清理，直到冷戰結束前日本認識世界與亞洲的圖式仍沿襲著二零年代的帝國主義觀點 (2004:6)。與二戰相關的命題——對於靖國神社英靈的朝拜、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否認、遊蕩在美國與亞洲間曖昧的歸屬……——於是陰魂不散地盤桓於當下日本知識界的國族敘事中，主要被歸類為右派的論述。

石原慎太郎的發言同樣也離不開這些命題。他的發言總是想要傳達一種團結而

同質的「日本」形象，此種將日本本質化，進而得以明確地自我界定以與西方進行零和遊戲的認識，承接了日本戰後流行的「日本人論」<sup>7</sup>，於是不僅令亞洲其他國家擔憂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再次復甦，同時也否定了日本國內的異質性，將日本本質化為一個陽剛的國族形象。他愈是煽情號召「正常國家」的自信，便愈益深刻地揭示了二戰的歷史傷痕尚未釐清，日本的自我定位仍舊難明。因此，觀察石原如何在排美拒中之間構築日本的主體性，以及此種自我認知與亞洲被拖入現代性規範系統時衍生的張力，將是本書藉以分析石原的第一個側面。

貳、去殖民或後殖民？

日本知識界在面對西方現代主義時的各種困惑游移，還帶出了另一個議題：面對西方，及隨之排山倒海而來的全球化敘事，加上懸而未決的過往遺恨，身在東方的自己果真找到安身立命的依據了嗎？

在一篇討論普世人權與亞洲價值之對立的論文中，井上達夫 (Inoue Tastuo 1999) 提出了 "Asian Orientalism" 的概念來評析石原慎太郎、李光耀等人以「亞洲價值」拒斥西方人權標準之普世性的說法。他認為這一擁護文化特殊性的邏輯除了以任意的地域性合理化了民族國家暴力之外，更大的危險在於它毫無反省地接受了東方主義認識論，接受了被西方所定義的「西方－東方」、「進步－落後」、「現代－傳統」的階序觀。人權是否具普世真理並非此處焦點，而是說，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在經濟領域唯恐不能與「國際」接軌，在文化價值上卻以相對主義修辭美化封建傳統、進而合理化體制性的壓迫，這般錯亂的徵狀必須回到歷史的糾結處求索答案。

石原慎太郎和馬哈地 (1995) 對殖民治理的歌頌、台灣人提及「二二八」和日

<sup>7</sup> 南博的《日本人論》從知識社會史角度，鉅細靡遺地整理了日本現代化過程中各種關於「日本國族本性論」的概念；而岩淵功一 (1994) 則稱呼這種在日本內部設立他者、從而將之排除以潔淨化日本形象的心態，與日本所惡之懼之的西方殖民主義恰恰形成了共犯關係。

治歷史時各種互不體諒的矛盾、乃至於中國境內全面高漲的反日情緒，這些層出不窮的發展在在顯示，身份認同的凝固傾向持續為各方互動帶來困擾，如果當事人對於形成這些身份意識的歷史脈絡不能回溯，則任何將當前紛爭加以歷史化的努力，勢必誘發各種情感和偏見的權力實踐，因此更需要後殖民式的分析，讓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相互構成的身份關係加以梳理，才有可能在凝固的身份主張中，找尋出路。

在這個向度上，荆子馨的提問對於理解這些現象邁開了重要的一步。他討論了台灣、韓國作為日本殖民地與殖民主義進行認同協商的過程，並問道：「到底是什麼構成了日本的去殖民過程？」，而他對這問題的回答是，不僅僅台灣、韓國由於戰後直接被編入冷戰圍堵線，從而被排除於二戰後小國去殖民化的世界潮流外，日本也出於相似發展軌跡遭剝奪了這段肉體經驗<sup>8</sup>，使得主流歷史書寫將過往一筆勾消 (2006:63)。若與子安宣邦對照著讀，荆子馨只是選擇了不同的修辭和理論路徑來包裹同樣的歷史因果解釋，這一差別源於他們關懷的對象不同：子安宣邦所關懷的乃是近代日本思想受限的意識範圍，而荆子馨的研究偏重於殖民地台灣認同形構的傾向性，後者因此更需要借重後殖民理論的視角，以觀照台灣在世界體系中既受到日本殖民、又間接受到西洋殖民的雙重邊緣性 (double marginality)<sup>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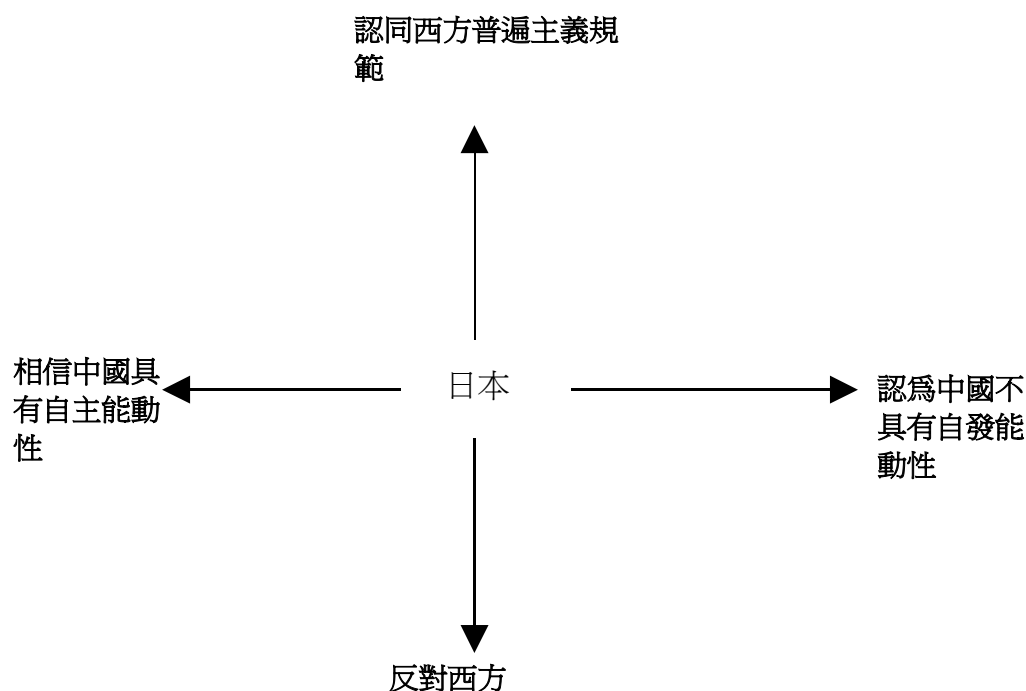
隨著身份政治的持續開展，戰爭記憶在日本和台灣以不同內涵卻又相互牽引的型態發酵著，以致於身兼侵略者與受害者角色的日本，一面要應付亞洲各國對於戰爭正義的索求，一面又無法平撫原爆受創的屈辱意識，在亞洲和西方間左顧右盼，難以安頓；而後起的台灣隨著戰爭中的皇民化、戰後的國共分治、

<sup>8</sup> 關於日本投降之後如何經由皇室與美國佔領計畫的合謀、妥協免除了天皇的戰爭責任，因而在反省未竟徹底的情境下埋下了日後右翼思想的根源，可參考小森陽一《天皇的玉音放送》。

<sup>9</sup> 此處借用吳叡人(Wu 2002:41)的語言。他指出：台灣在二十世紀初期世界的帝國主義擴張混戰中處於邊陲，而日本恰好佔據了在台灣的絕對邊陲與現代性中心的西方之間的半邊陲位置，為了減緩台灣人對於日本的抗拒，日本於是採用了“差異化整合”進行殖民地統治，透過將台灣與南韓人塑造造成“次級日本人”進行有限度的同化，來確立其在現代性象徵序列上的權力正統。他將這一情境稱為“雙重邊緣性”，以凸顯西方老牌殖民帝國—日本—台灣在這一權力版圖中的序列關係。

冷戰圍堵、統治菁英本土化和政體民主化的一連串變革，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論述逐漸茁壯，與中日兩國間千絲萬縷的糾纏則不斷被挪用與再詮釋。有論者認為這種借用日本右派敘事抗拒中國的身份策略，是一種「日本情結」(徐宗懋:1997)的表現，乃構成來自西洋、中國、日本與後殖民台灣等眾多權力向度交錯的漩渦。

在日本，國家主義者的敘事帶著對「西方－自我」關係的困惑，參與地緣政治的角力和國際貿易的競逐，試圖在其中鞏固國家利益進而重塑認同。雖然石原慎太郎在不同時期對於美－日－亞洲/中國關係的構圖，往往依隨國際政治經濟的格局而擺盪，然而回答的根本課題，仍不脫日本能否扮演一個具有真正意義的普遍性文明角色。另一方面，在國際政治結構中能動性有限的台灣，亦在大國的牽制下一再詰問 (interrogate) 歷史，不論是自我潔淨而高唱本土化、浪漫化殖民歷史、強調多元模糊與混血、或全盤擁抱西方普遍主義價值，都在臨摹某種不受到宰制的集體身份。以下試以圖繪說明台灣和日本的認同形構，及「中國」、「西方」在這些情結當中的相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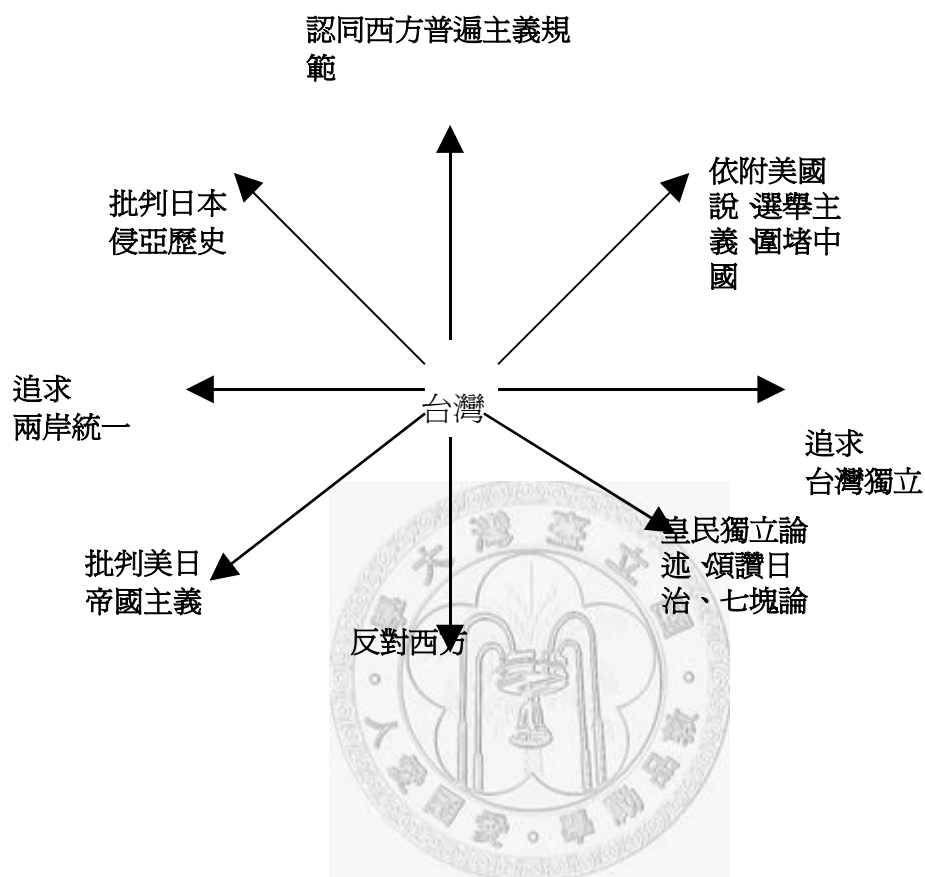
已有愈來愈多學者注意到，日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以西方的普遍主義認識論，來建構日本自身的特殊主義，過程中日本於是發展了一套「東方的」東方主義認識論，在亞洲內建構自己的他者，並且原封不動地接受西方定義好的文明等級 (Tanaka 1994: Introduction; Iwabuchi 1994 ; Shih 2003)。「東方的」東方主義與 Said 的「西方的」東方主義不同之處，在於東方的東方主義強調的，不是透過與落後的外在他者的對立，來反射自身的普遍與先進，而是將他者視為自身的責任，成為自身朝向西方現代性從事修養的內在他者，共同邁向普遍的真理境界。這樣的認識方法不但驅動了日本對亞洲諸國的全面侵略，也在冷戰結構下美國對於日本全面接管、保護之際，更讓日本喪失了主體精神，從亞洲諸國撤回，全心全意於自身的修養學習，故未能出現如非洲新興國家般對西方帝國宰制的全面批判，或者抱持「『歐洲』在道德上以及精神上都是站不住腳的！<sup>10</sup>」的態度。當新興民族國家以泛非洲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泛阿拉伯主義等多種綱領血淋淋地剷除帝國主義幽靈時，冷戰結構下迅即編入美國保護傘的日本，完全被阻絕了此等空間，甚至因美援造就了經濟成長後，對其他東亞國家再度進行支配 (荆子馨 Ibid:pp.61-79)。

上圖是對於近代日本自我認識與國際關係的模擬。橫軸象徵日本在「排除中國」與「親近中國」之間的選擇，而縱軸則是「認同西方普遍主義」與「反對西方」兩種態度。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知識界對於自我的界定便在這兩個向度之間搖擺，「是否要抗拒代表近代性的歐洲？要不要以歐美價值作為觀看世界的參照系？」和「是否要排除漢學的中國性？要不要站在中國的眼睛裡看世界？」構成兩個關鍵問題，主導其身份策略 (石之瑜等：2007)。

而台灣出於在帝國殖民體系中的雙重邊緣地位，二次大戰後與日本分享冷戰、美援、經濟起飛等相似歷史經驗，在解嚴後的民族主義論述也幾乎喪失對於殖民經驗和國際霸權的批判、反省能力，對日本殖民經驗呈現一面倒的理想化或

<sup>10</sup> Aime Casaire 語，轉引自荆子馨前揭書:pp.65。

妖魔化，而追尋法理獨立的論述更甚少能夠質疑美日強國氣象之下的帝國支配心態。試將解嚴後台灣知識界、政界關於統獨的爭辯圖繪如下：



Jan Nederveen Pieterse 和 Bhikhu Parekh (1997) 兩位學者將戰後挑戰帝國殖民的理論與實踐區分為三種層次：作為解殖民策略的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 (nationalism/localism as de-colonisation)、內在解殖 (internal de-colonisation) 和後殖民性 (post-coloniality) 三種進路。解殖民的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乃是指二戰結束之後從非洲、中東至於印度國家對於歐洲中心主義、東方主義認識論和文化帝國主義所提出的批判，他們以本土主義、自力更生和文化抵抗運動掙脫帝國主義從政治到文化的枷鎖；內在解殖則是在民族國家內追求經濟與社會的解放，使權力由男性/菁英/仕紳階級/主流社群的手中下放到非中心的女性/草根大眾/少數族裔/本土原住民。最後，後殖民情境對於解殖民族主義或內在解殖視為前提的疆界概念提出質疑，隨著全球化結構下跨界移動交流的遽增，過去在文化抵抗運動與歐洲中心主義之間決然的西/東、自我/他者、中心/邊陲分界已然模糊，原本

視為彼此區隔的文化歷史脈絡或政治權力體系，甚至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之間，相互滲透，益加緊密，因此學者乃提出一種奠基在混血 (hybridity) 之上，強調越界和草根民主、文化民主的後殖民情狀作為對解殖認識的超越，在其中「東」與「西」都成為流動的意象，而認同則是種不斷發生互動所必須的身份策略。

台灣與日本在錯過了第一波具有解殖動能的民族主義發展後，是否能夠在後殖民情境中對帝國的魅影進行更有批判性的回應？石原慎太郎的「『正常』『國家』」，台灣獨立主義者所追求的「『新興』『民族』」，是否可能走向一種有解放意義的論述？或者，我們注定只能在敵我邏輯的餵養下吐絲結網？在第四章與第五章中，將藉由這些概念的分佈，對於台灣和日本的民族主義敘事展開更進一步的解構。



####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章節設計

文本分析是本書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所分析的資料包括石原慎太郎的作品，尤其是他用來進行政治宣示的文本，與描寫其從政心路的回憶錄。此外也將交互運用思想史研究進路中所謂的「外在研究法」與「內在研究法」(黃俊傑、蔡明田 1997)，前者即脈絡化地考察發言者的歷史處境與思想脈絡，後者則意欲挖掘各單元觀念 (unit-ideas) 之間的聯繫，貫穿全文的仍是一種詮釋學式的認識方法以期勾勒出在日—中—台三角關係背後複雜的認同圖譜。故本書將力求以癥狀式閱讀 (symptomatic reading) 捕抓出各種宣稱、評論及斥責背後的「問題意識」(the problematic) 及「理論範型」(the thematic)<sup>11</sup>；據此非但可對應所有譯自日文的文本亦可處理來自兩岸中文文獻中對於日本右翼的評論。將評論與回應的文獻與文本本身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審閱，各種身份策略之間的相互依賴與相互構成方能浮出水面，從而取得一種移動的批判位置，反思帝國、霸權與他者之間互動的各種

<sup>11</sup> 亦即 Chaterjee 在 "Nation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Thought: a derivative though" 中提出的方法。詳見 Chaterjee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Post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Ch.2: The Thematic and the Problematic

意義，乃至站在不同的位置互相揭發「自我」、「他者」、「先進」、「落後」、「殖民者」、「被殖民者」等權力關係的再製。

出於作者本身的語言知識限制，本研究中大部分的資料將來自中英文報紙、專書與論文，而較少採用日文資料，亦無法納入日文學界關於石原慎太郎的研究。如此的資料使用必然會阻礙讀者理解石原思想的全貌，但本研究並非以石原的思想真相為目的，而意在將石原慎太郎作為工具來解剖台灣、中國、日本之間的認同政治軌跡。未來的中文學界若有以日文資料為本的石原慎太郎研究，亦歡迎指正和對話。最後，為瞭解石原慎太郎與台灣各界交往的歷史，也將針對與石原有私人交誼者進行個別人物訪談，以重現石原與台灣發生交會的過程，和台灣政界對其的觀感。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章為導論，說明問題意識及概念溯源。第二章將介紹作為文化人的石原：1955年《太陽的季節》的獲獎與隨之而來的負面評價，讓當時仍就讀於一橋大學的石原慎太郎一夕爆紅，開啓了他的公眾人物之路。本章中將首先探討其文學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審美觀與信仰，藉由整理《太陽的季節》的作品內涵與圍繞它的各種毀譽評價，回到戰後日本的時代氛圍中追索幾個重要的時代意象：美國介入下所形塑的「民主」與「和平」體制，冷戰格局，和隨之而來的高速經濟成長與日美安保條約。他的「文學行動主義」及與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等同時代作家對於日本自我處境的觀點也將納入比較。

第三章為石原慎太郎的政治主張分析。在這一章中將整理一系列政論作品「可以說No的日本」、「日本堅決說不—戰後美日關係總結」、「亞洲堅決說不」、「日本直到永遠」的國際關係構圖，同時探討和共有交誼的佐藤榮作、竹下登、小泉純一郎等人的思想聯繫，最終冀能在這一章中整理出日本右翼在戰後關於日美中外交的思考，其外交政策與認同取向之間的互動，與石原在這一系譜中的位置。同時也將納入西方——主要為美國——對他的評價，從而呈現日美之間相

互認知的本質。

第四章討論中國與台灣的石原情結。首先分析石原對於中國的看法，包括其如何交互運用國家利益修辭和各種輕視中國的語言暴力，甚至玩弄日中台關係塑造緊張感；接著整理中國各界關於石原的批判及這些立論所奠基的史觀，試圖發掘：他們是否有立場上的差異？又或者是死水一片？他們與石原所代表的立場之間是否存在溝通的可能性？接著台灣面對石原及日本右翼的情結。首先將分析石原對於台灣定位的看法，具體事件包括他在 1999 年當選東京知事後幾度前來訪問時的發言，及其與台灣社會各界的互動，乃至於台灣媒體與各方政治、文化人物對於他的評論。本章重點在指出對於歷史的分歧詮釋如何為不同身分主張的人提供論述的資源，而這些論述的產出又具有哪些貢獻或危險。

第五章為結論。在這章中將整合以上三章的討論，首先再次總結他在日本右翼思想中的定位，並且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分析：石原為何能在日本社會掀起旋風？日本社會對他的支持，反映出何種對於國家與政治性的感知呢？接著分析中國與台灣各自面對石原時折射出的認同困惑，從而比較：中國、台灣乃至於日本的民族主義敘事中如何想像「國家」？而這些投射及想像又如何牽動三者的互動？當中有沒有生機可言呢？

民族國家從曾經堂皇承擔政治能動性的載體，逐漸成為一個人人爭相解構的概念，這其間流淌著的是幾世紀的鮮血與犧牲，是尚在持續的記憶與文化戰爭。透過即將展開的一連串耙梳，期望這份研究不僅僅是對於一段政治史的詮釋，同時也是一段穿越 (traversing) 暴力和幻見的跋涉。

## 第二章：文學家石原與戰後日本的曖昧

「叛逆、責任、道德，雖然那些傢伙說著冠冕堂皇的話，我仍不懂那些字眼的意義。光是去作自己真正想作的事，我就已經應接不暇了。」

（石原慎太郎，《處刑的房間》）

### 第一節：「太陽王」的誕生

1932年，石原慎太郎出生於神戶市兵庫縣。他的父親是一名白領階級，在山下輪船公司擔任主管。1937年，石原慎太郎一家隨著父親的工作搬遷至北海道的小樽，在那裡石原兄弟度過一段優渥且愜意的童年時光，就讀全市最好的私立小學，生活絲毫未受到中日戰爭的影響。1944年，隨著父親的工作調動，又舉家自北海道搬至東京近郊的神奈川地區，就讀於湘南中學 (Nathan 2005:161)。這時兄弟倆央求父親買一艘遊艇，而航海也就成為日後石原小說中常見的素材 (謝志宇 2005:233)。

不久，石原的父親在上班時間因心臟病發去逝，這為石原一家的生活帶來遽變：首先是家中頓失經濟依靠，必須靠著有限的撫卹金過生活，使身為長男的石原慎太郎毅然挑起一家之長的責任，協助母親度量支出 (1987:46)；此外，他的弟弟裕次郎開始加入鎮上富家子弟的幫派，聚眾享樂、滋事，動輒與警察起衝突，因此慎太郎必須扮演父親的角色，管教弟弟的起居行止 (Nathan 2001)。高中畢業後，石原慎太郎便休學在家，照顧母親與弟弟。

雖然父親早逝，其形象對石原慎太郎發揮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在帶有自傳色

彩的隨筆集《斯巴達教育》中，多次提及父親堅毅奉獻的工作態度與嚴厲的管教，並對此流露出崇敬之情：

我的父親，於船舶業不景氣時，又受造船瀆職事件的連累，在一艘輪船上心身憔悴地奮鬥著，二度因高血壓而病倒母親擔心他的健康，哀求他停止公司的業務，休養病體，父親卻若無其事地，常在孩子面前說道：「能為自己的工作而死，那是我最大的願望。」結果，在會議上一病不起，真的為了他的工作而逝世了。

我從未見過「死」，但看到父親僵硬的遺體，卻從那裡看到一個對自己工作懷著無比自豪和自信無名英雄的姿影。

(1987:9)

在另一篇題為「不要怕體罰孩子」的文章之中，他則將父親與孩子之間的肉體接觸稱為「比情人關係更密切」的互動，而體罰行為更被他稱為父愛的表現—

回到家裡，父親狠狠地揍了我這個「冒險隊」的「隊長」，我非常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體罰。但是當父親寬而大的大手，在我臉頰上開花的同時，我卻感覺到父親的愛意，一直到現在仍深銘在心。

「體罰」，他把父親的意旨直接了當、了無修飾地傳達給孩子；而其中的含義，不外乎是——愛情。

懷著對於早逝父親的崇敬與想念，成年後的石原慎太郎日後也以「嚴父」形象聞名。在《斯巴達教育》一書的序言中他便指出，寫作該書目的是從一位「父親」的立場出發，提出教養孩子的一百項「法則」，而其根本信念乃是「叱責」與「嚴厲」更能帶給孩子美德 (Ibid: ii)。而這樣的教養信念也果真為他創造出令人稱羨的模範家庭，陽剛的父親形象構成其政治家身影的一個鮮明側面<sup>12</sup>。

1950年，在家庭長輩的建議下，石原慎太郎放棄原本心儀的法國文學系，進入一橋大學會計系就讀。大學三年級時，同學邀請他投稿副刊的《一橋文藝》雜誌，他以弟弟裕次郎及其朋友們放浪不羈的生活為藍圖，創作了第一篇小說〈灰色的教室〉。小說獲得的好評令石原大受鼓舞，乃著手撰寫中篇小說〈太陽的季節〉參加雜誌《文學界》(《Bungakkai》)舉辦的新人獎，隨即得到首獎。那時是1955年。

1955年，日本脫離戰敗十年，美國甫以片面媾和形式結束了戰後對日本的佔領。在此氛圍下，當時成熟作家的作品往往仍無法擺脫戰爭記憶，充斥著大戰夢魘的囁語，而《文學界》獎項的評審群則為〈太陽的季節〉所描摹的年青人面貌所動容，認為該小說成功地以「『十足的隨意口吻』(utter casualness) 傳達了邊緣青少年的憤怒與敗德」，恰恰呼應著世界戰後文學 (après guerre) 的潮流，表現了新世代面對戰爭創傷的憤怒、迷離、自我放逐 (Sherif 2005:195)。1956年初，這篇作品又獲得了文學界的大獎《芥川賞》，然此決定隨即引起社會譁然，作家中野茂村直批此乃玷污芥川獎的悠久傳統與地位，另外還有數位作家亦表示芥川獎不該肯定此種「任性青年的猥褻文學<sup>13</sup>」(謝志宇 Ibid:234)。

<sup>12</sup> 石原慎太郎有四個兒子，長男伸晃承其衣鉢，為日本參議院議員；次子良純是舞台劇與電影演員，三子原為銀行高級主管，後亦進入眾議院；么子則為藝術家。2001年，次子良純將童年日記出版，書中將父親描繪為嚴厲的訓導者，孩子們都對其高壓統治感到不滿。在接受 John Nathan 訪談時提到這本日記，石原則顯得不悅，表示這是「給偷窺狂讀的垃圾」(Nathan 2005:167)。

<sup>13</sup> 其實小說中並沒有大量性愛場面，而多以明快筆法推進人物的互動，但幾乎所有關於本作品的評論，皆不忘引用主角初次發生性關係前，男主角「以勃起的陰莖戳破紙窗」(石原慎太郎



以富家青年的性愛追逐為主題，以酒吧、遊艇、旅館和豪宅為場景，又以女主角的死亡和男主角的迷惘告終，今日看來這篇小說彷彿只是平凡無奇的言情故事；但在 1955 年的東京，當年方二十的石原慎太郎選擇親弟弟為書寫題材，其關懷已無涉道德立場的贊許或批判，而既是謳歌著青春的複雜樣態，也預示著日本告別戰敗蕭條後嶄新時代旋律的端倪。在 2001 年為東京幻冬舍重新出版〈太陽的季節〉等四篇小說合輯時，石原慎太郎透過〈後記〉回憶寫作當時的心情：

當時正值日本社會從戰敗後的荒蕪重新復甦之際，好不容易正要迎接消費時代的來臨，也就是正值一個未曾出現過的文明逐漸到來的時代。由於之前戰爭以及戰後的荒廢狀況已漸漸消失，對眾人自由的壓抑不再，每個人都想竭盡所能地在人生當中展現出自己的情慾，希望能脫去壓抑本能的枷鎖，以從中獲得心理補償的生活。

看到從這種新風潮中，所誕生的感性以及行動而帶來的社會風氣後，許多深知從前壓抑枷鎖的人，仍將這樣的現象當成洪水猛獸一般，批評太過放浪，責備這樣乃是不道德的行為，然而這樣的風氣仍逐漸以消費的美名融入到大家的生活當中。……在現今的社會中，過度自由、過度享受、過度刺激，為大家帶來負面的頹靡安逸，但是人們卻因為年青的放浪不羈曾經被責備的緣故，而變得不夠大方以對。從我這種曾經度過被人責難的青春時代的人來看，現代人所謂的青春根本可說是宛如被人放在無聲的房間當中，總有一種漠不關心、毫不反抗的懦弱感覺。

總而言之，我的青春就如同收錄在此的作品一般。直至今日，我仍保持著往常的心情，絲毫不覺得障礙或恥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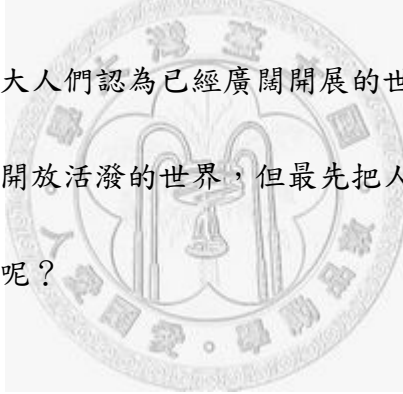
2004:38) 的文字，而這一畫面也就為這部作品種下爭議形象。時至今日，或可判斷石原的快意描寫並非偶然，從小說中一個又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主角，乃至對父親威嚴的歌詠，男子氣概的凸出是石原的特徵之一。

對上一代教育與大傳統的反叛及懷疑，是戰後崛起作家普遍的心理。比石原小兩歲的大江健三郎，就對大人們在戰敗時丕變的說法感到荒謬—「直到盛夏之前，老師們原本說著天皇是『神』，要我們朝著相片膜拜，還說美國人不是人，是鬼、是野獸；突然間他們毫不在意地說著完全相反的事情，完全不提之前的想法、教法錯了，需要反省，祇是非常自然地改口說，我們天皇也是人，而美國人則是朋友。」因此「戰爭結束之後，我就不上學了。」(2002:2ff) 思及戰敗當下的感受，石原也有著類似的反應：「戰爭中，他們教育我們，為天皇而死是光榮的；可接下來我所知道的全是懺悔、民主、和美國相處等等。大人們顯得既膚淺又虛偽。」這些叛逆的態度明顯不同於在戰爭時已成年、並已開啓寫作生涯的三島由紀夫。戰敗時正滿二十歲的他，感受到與傳統被割離的憂惶：「戰爭結束了，當我聽到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心中唯一想到的只有金閣寺。金閣寺與我之間的關連被切斷了，我想現在我要回去，回到一種美在一端、我在另一端的狀況。」(Nathan 1988:67) 而對石原和大江的世代而言，比起家國、傳統崩潰的憂懼，更切身的問題是如何在價值系統一瞬改朝換代的文化真空中，覓得安身之路標。壯年後的大江成為日本新左翼健將，以普遍性的人道主義話語持續思索戰爭反省與和平締建；而缺乏戰爭創傷體驗的石原則理智氣壯地輕蔑上一代的戰爭意識，進而轉向對自我感受、信念的探索與肯定。不止一次他強調自己是個「存在主義者」，重視個人的激情與創意，因此他自豪於不為固有道德價值所稱許的青春體驗，擁抱熱烈的情感與都市消費體驗中流竄的欲望，並對「大人們」緬懷的傳統嗤之以鼻。

在〈太陽的季節〉中，他是如此刻劃老一輩的迂腐與年青世代的徬徨：

如果大人們不要毀壞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並且能夠重視晚輩的話，那麼他們不得不害怕的便絕非是共產黨。事實上，他們也不害怕。他們在這枯竭的土地上，不知不覺地用自己的雙手孕育了新的情操與道德，並培養出創新的人類，就像在沙漠中的仙人掌，雖然乾渴卻仍得意洋洋地開著花，那些在乾燥地面上綻放的花兒們，並不覺得自己的土壤是乾枯的，這實在是很可悲。

旁人用來責難的那一套標準，事實上他們相當憎惡，因此在潛意識中更試圖去破壞它。大人們認為已經廣闊開展的世界，事實上反而變得狹隘，他們要求更開放活潑的世界，但最先把人類的情感當作作品來衡量的，究竟是誰呢？



(2004:p.33-34)

雖然石原在將近四十年後的後記中指出，「青春」是一種跨越時代、無以倫比、永遠應該被祝福的價值 (Ibid:365)，但在這段他二十三歲時書寫的文字裡，所描繪的絕對不只是一股跨時代青年共有的叛逆性，而也蘊含著 1950 年代日本社會的經驗，一種冷戰結構下帶有「美國性」的消費社會體驗。根據吉見俊哉 (2002) 的研究，戰後日本對於「美國」的認識是建立在「基地」與「消費文化」間的二重對立上，前者象徵軍事與政治的支配狀態，而後者是經濟與文化的慾望對象，此二層次權力的互動便形構了日本面對美國愛憎交織的自他認識<sup>14</sup>。二戰後美國在

<sup>14</sup> 根據吉見俊哉的看法，這兩種「美國」的意象並非對立關係。作為軍事強權的美國符號與暴力、帝國勾連在一起，是日本從上到下都亟欲抵抗的，但作為經濟文化領導象徵—易言之，作為現代性表徵—的美國，則迅速填補了戰後日本集體認同的真空。兩種「美國性」的脫鉤，於是也為日本創造了內在的他者，使得各種欲確立「日本特性」的政治論述必須往斷裂而遙遠的傳統求索，卻更顯虛無而緣木求魚。

日本設置基地，圍繞著佔領設施也創造出活躍的大眾娛樂文化，成為年青人流連之地，〈太陽的季節〉主角正是邂逅於充滿美國情調的銀座地區 (Ibid:77)。因此，石原筆下「雖然乾渴卻仍得意洋洋地開著花」之意象，何嘗不是戰後日本青年獨有的困惑：他們既要承受敗戰衝擊下傳統被瞬間抽乾的集體空白，又迅即被推入消費文化生產的誘惑中，追隨高速經濟成長所勾勒的慾望法則。石原慎太郎看見了時代的轉向，於是透過小說人物的暴力、憤怒、自我中心來呈現其所屬世代的徬徨，而隨後所吸引的廣大迴響，也印證了此一心理的需要。

在褒貶兩極的評價中，石原慎太郎與弟弟迅速崛起為大眾文化的明星。〈太陽的季節〉在出版一年內暢銷近三十萬冊，創下戰後小說的紀錄；1956年，〈太陽的季節〉拍成電影，兩兄弟皆參與演出，片中「敗德」的情節引起諸多民間團體抗議，卻也在年青人間掀起流行旋風，影迷們模仿片中人物穿起夏威夷衫、寬大的褲子，以「太陽族」自居，髮廊將片中髮型命名為「慎太郎頭」招攬生意；隔年再推出石原慎太郎撰寫劇本、裕次郎擔綱演出的續集電影「瘋狂的果實」，裕次郎就此成為超級明星，兩兄弟也陸續又合作了十幾部電影作品，將石原裕次郎打造為 James Dean 般的叛逆英雄，石原兄弟成為那一代憤怒青年的偶像<sup>15</sup>。

在 1966 年受《朝日新聞》雜誌之託赴越南採訪以前，石原慎太郎一直過著奔放的名流生活：他大量創作小說、劇本，執導電影與舞台劇，成為全日本稿酬最高的連載作家；他騎摩托車橫跨南美，並將這次經歷寫成了一本暢銷的回憶錄；他駕駛遊艇環遊世界，最遠至於北極。然而，1966 年的一趟越南行，卻成為他由文壇跨足政治領域的轉捩點。

---

<sup>15</sup> 值得注意的是，石原的優渥身世使他成為特定生活經驗的傳播者。他在訪談中提及：「當時除了東京以外，日本其他地方都落後地令人難以置信。大多數孩子都沒見過遊艇、滑水和摩托車，當然更沒有像我們那樣和女孩子在一起。我們買了作女孩子裙子的、顏色鮮豔的花紋布，讓裕次郎的一個女友縫成襯衫，所有人都迷上了。年青人竟然這麼盲目，讓我覺得驚訝。」在戰後積極重建、發展不均的日本，東京仍是文化朝聖的中心，足見單以世代的憤怒情緒不足解釋〈太陽的季節〉的走紅，在物質層次所提供的新鮮感與異國情調，亦扮演推波助瀾之力量。

## 第二節 從政之路

從 1955 年自民黨掌握執政主導權<sup>16</sup> 至於 1970 年之間，日本國內政治的對立始終與國際情勢緊緊纏繞在一起<sup>17</sup>。更精確地說，在美國強加的「民主－和平」體制下，國內左右兩派勢力間「護憲－和平主義」和「修憲－重新武裝」的持續角力，不僅僅是關於日本國家定位的歧見，亦是關於冷戰結構下「日本如何面向他國？」的世界觀辯論。在右派觀點中，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條款致使日本國家主權跛腳，亟欲脫離舊金山媾和後的從屬性地位，以修憲確立日美平等的「夥伴關係」；而左派既批判美國勢力在東亞的擴張，也欲維護和平憲法，唯恐再次捲入戰爭。1960 年，岸信介內閣強行修改美日安保條約並續約，乃基於相信國民重視國家的全然獨立甚於和平憲法，孰料此舉卻引來大規模的社會抗爭，顯示：國民不但害怕再次捲入戰爭，也已認同和平民主體制與國家意識的複合關係，就算其間存在矛盾，國民仍希望能同時擁有自主獨立的國家與免於戰爭恐懼的權利（孫政 2005：137）。

安保運動落幕後，反美、反戰的情緒持續發酵。因應傳播媒體的「大東亞戰爭熱」，知識界紛紛對大東亞戰爭提出反省，正反評論在知識圈中針鋒相對<sup>18</sup>；新左派則藉批判美國在遠東的軍事擴張，抨擊日本的「民主」「和平」體制與經濟成長僅是帝國結構的產品、布爾喬亞自利情結的表現（Dower 1993:21）。社會上呼應的抗爭風起雲湧，高速經濟成長的負面效應引起了基層的各種社會運動：尋求

<sup>16</sup> 1955 年，日本的左、右兩派政治勢力相繼完成整合，並在眾議院大選中囊括 97% 選票，自民黨與社會黨的力量形成 2:1 的對比。這一對抗格局後被稱為「55 年體制」，以保守獨裁的作風主宰日本內政將近四十年，直到 1993 年大選，自民黨失去獨大優勢被迫組成聯合內閣，55 年體制才告崩解。

<sup>17</sup> 「55 年體制」所彰顯的不僅是「護憲－去武裝」/「修憲－重新武裝」之間的意識型態對立，在冷戰國際格局的牽動下，兩股勢力的互動也一再生產出新的衝突，以及對日本民主發展和國家定位的歧異理解。歷史學家 John Dower 便認為，1951 年舊金山和會的締盟與 1955 年體制的成形，是決定戰後日本政治發展的兩層結構，而其間存在的張力在往後日本政治中便呈現為「民主」與「和平」兩種價值目標的衝突。更細緻的分析詳見 John Dower, “Peace and Democracy in Two Systems”, in Dower, John (ed). 1993,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3-33.

<sup>18</sup> 包括竹內好寫作了〈關於戰爭體驗的一般化〉等一系列文章重新思考戰爭體驗；哲學家上山春平發表〈大東亞戰爭的思想史意義〉，藉由回顧日本參戰與戰後發展，抨擊日本在新的冷戰結構中成為為虎作倀的美帝幫兇；曾經為左翼陣營要角的作家林房雄亦發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要求擺脫「左/右」「善/惡」的判斷模式，發展一種非意識型態的「日本式『心情』」。可參考：孫歌《竹內好的悖論》第四章(2005:北京大學出版社)。

戰爭賠償的「戰爭受害者運動」、抗議環境傷害的環境保護運動、要求合理住屋分配的「住民運動」、抗議不當勞動條件的工人運動、以及反戰意識下激越的大學生罷課潮，都在六零年代的尾聲高分貝挑戰著自民黨執政的正當性 (Ibid)。

正是在這此氛圍下，1966年年底越戰方酣之際，石原慎太郎接受《讀賣新聞》雜誌社委託，前往越南採訪。行前面對國內左右派主張的對峙，石原慎太郎始終清楚認同自民黨的立場。在安保反對運動期間，他大力主張續約是正確選擇，但反對國會不顧民意強行通過的作法，因此夥同文評家好友江藤淳成立「有朝氣的日本之會」，推動國會的民主化；在安保抗爭的輿論沸騰中，他為文反對群眾因盲目反美而瘋狂反對安保續約，鼓吹揚棄「絕對主義與粗糙的二元對立論」，並評論抗爭中死於劇烈衝突的東大女學生樺美智子為「自己踏死自己的女學生」(石原慎太郎 2006:15)；目睹國內的反戰潮浪，他更對所謂進步知識份子語帶奚落，認為其祇是出於下意識地反美因而愚蠢地投向共產主義陣營：

把完全不符合人類攝裡的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型態，褒揚為比我們的更為人性化……他們的愚蠢是對日本強制以叫做民主主義的絕對方針統治過的美國，在下意識的屈從與意識上的反彈，而對當時對立的另一個意識型態所統治的社會主義體制產生了無謂的幻覺之故吧。……因此，雖然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注意到，他們的那種想法也可以說是非常有民族主義性的<sup>19</sup>。(Ibid:8)

<sup>19</sup> 在這一段話之前，石原也提及在戰爭中價值皆乃相對，進而嘲諷「天真的日本人」憑著「不徹底的知性」，往往陷入粗糙的善與惡、白或黑的二元論，但在戰爭中「這些價值是行不通的」(石原慎太郎 2006:7)。此處，石原的修辭呼應了林房雄、西田幾多郎等浪漫民族主義者的立論，透過拋棄所有被視為「外來」的價值體系，得以獨尊「非意識型態」的獨特之物。在西田幾多郎的哲學裡，該獨特之物便是其所謂的「虛無之地」，虛無之地存在於日本皇室；林房雄與同道的浪漫主義作家則設定為「日本精神」，亦即純潔、英勇、美等特性，一種「可以讓人為之獻身的事業」；三島由紀夫亦繼承此思考，在小說中鼓吹殫精竭慮地追求「美」，要從「高貴的祖先」之處繼承美之傳統 (Nathan 2004:115f)。石原慎太郎雖不若前述幾人如此義無反顧地吹捧傳統，他的思考方法亦是承襲上述浪漫主義者的模式，而在其哲學中心處置放的正是「國家」；為了「國家」故，為了成全「國家」之利益，善惡皆可拋，左右亦不拘——其就任東京都知事後效法左派主張課徵銀行「石原稅」即是一例。

懷著此種情緒抵達越南，石原眼中的越南人民與知識菁英對戰爭表現出一種「漠不關心與近乎犬儒的態度」，除了疲憊之外，對政治的態度僅剩冷嘲熱諷。歸國後，石原回想起越南見聞，獻身奉仕之念乃油然而生：

這應該是我在西貢見到的每個很有知性的人們，那種自暴自棄似的對於自己明天的命運的冷笑和不關心使然吧。我好像在這裡見到了和我的祖國日本的強烈類似之處……自負日本的知性、進步性的很多人，他們的心情和精神即使與越南人有些不同，但在日本現況下對於明顯存在的缺點，不停高聲責難的人數越來越增多時，若處理不當，或許這個國家也會有意料之外的絆倒。（Ibid:14）

是的，在病床上我回想越南，從回想越南著手去想過去沒有想的世界，也在思考日本這個國家時，將從越南回國時的路途上想到的擔心的事重新加以思考，然後再問自己，如果你那麼擔心的話，為什麼自己不去找一找防止它的方法呢？終於我這麼想著。

(Ibid:18)

在日後訪談中回想起這段過程，他表示，此時對於日本國家前途的憂心，即是擔憂日本將步越南後塵淪為共產主義國家。顯然在步入政壇之前，石原認同自

民黨、憎惡左派的立場已再確定不過 (Nathan 2004:168)。因此他以「在體制內革命」作為競選口號，「體制」指的自然是既存的政黨格局以及選舉民主制度，而革命呢？此時的石原已有了具體的國際政治主張，在左右兩派爲了日本應否擁有核武器激辯之際，他的重要競選政見便是日本應開發原子能源，以抗衡美蘇的支配恫嚇，這是一個以「和平」爲目標的選擇，至於開發原子能源後是否要發展核武，可交由全民公投決定。雖然小心翼翼地將自己與「核子武器保有論者」劃開，輿論仍將其視爲左派和平主義的敵對者，往後《朝日新聞》便邀請其與大江健三郎就此議題進行了辯論 (石原慎太郎 2006:51f)。

石原慎太郎的議員之路走得堪稱平順。獲得自民黨的背書以及已成爲巨星的胞弟替他巡迴拉票，他以創紀錄的三百多萬票當選參議員。四年後，他又競選眾議員，同樣順利當選，就此連任八次。1973年，在日本與中國恢復邦交之後，他號召參眾兩院 31 位議員成立「青嵐會」，並且歃血爲盟以昭「以生命實踐政治理想」的決心 (Ibid:194f)。

青嵐會有六大宗旨：一、維持自由社會，堅持外交應與自由主義國家群保持緊密聯繫。二、發揚國民道義，改革物質主義，應斷然進行教育正常化。三、照拂弱勢者，建立社會正義，排除富豪之不勞所得。四、爲建設和平國家，在和平須來自自衛的前提下，向國民訴求國防與治安之必要性。五、爲其在新的歷史中日民族之真正自由、安全與繁榮，制度自主獨立的憲法。六、黨的運作應打破安逸的妥協、官僚化與機會主義化等弊習 (Ibid:199)。這當中第一項第四項與第五項都呼應著強硬右派的立場，故青嵐會自成立之初便被視爲極度鷹派的團體。而堅持不與中共同路的外交立場也清晰體現，石原與青嵐會會員多次批評日本政府不應該「拋棄台灣」，並曾率隊赴釣魚台群島宣示日本之主權。

然而，石原慎太郎並非同時代文人中介入政治的唯一一人。透過各種公開行動，與他年齡相近的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都勇於對動盪的日本政治提出自己的主張，其中在 1970 年 (昭和四十五年) 年底切腹自殺、要求恢復日本傳統的三島由



紀夫，既是石原的好友，也是最常被拿來比較的對象。同樣以挑戰時代禁忌的小說寫作出身，同樣在政治光譜上被歸類為極右翼的兩人，一位成了叱吒的政治家，一位卻以決絕之姿死諫。究竟這兩人對於生與死、政治與文學的看法有何不同？其間差異可以如何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戰後日本的時代矛盾，與石原慎太郎的人格特質？

1925年，三島由紀夫出生於一個公務員家庭，本名平岡公威。1941年在中學就讀時，他的小說作品《繁花盛開的森林》獲得國文老師清水文雄推薦，連載於四位學院派評論者所合編的《文藝文化》雜誌上。該作品強烈的浪漫主義傾向受到包括林房雄在內等浪漫派作家的激賞，他們的鼓勵提攜使三島由紀夫創作不輟，也影響三島開始閱讀日本中世文學，尋找傳統精神中的「純潔」與「美」。1944年《繁花盛開的森林》出版成冊大賣，1949年三島又以《假面的告白》奠定新進作家的地位。三島自石原的作家生涯初起時便是其支持者，兩人筆下具有極端性格的人物時常被相提並論，而石原以〈太陽的季節〉竄紅時，也正好是三島由紀夫以《潮騷》、《金閣寺》廣獲尊崇的寫作生涯顛峰。根據石原的描述，三島介紹他接觸文人與文學評論家，石原則成為三島在感官世界的嚮導，領其流連於夜總會、拳擊場 (Nathan 2001)。

1961年發表的短篇《憂國》中，三島開始把長期探索的死亡、肉慾主題與「向天皇效忠」的愛國情操合而為一。《憂國》以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六事件」<sup>20</sup>為背景，主角是一名年青英俊的自衛隊軍官，他不願攻擊被視作叛軍的好朋友們，在二月二十七日黃昏決心切腹自殺，於是與新婚妻子在熱烈而嚴肅的最後一次肉體結合後，雙雙自盡。三島由紀夫將此情節形容為一樁「極樂事件」，鉅細靡遺

<sup>20</sup> 1936年(昭和11年)，日本軍隊中分裂為年青的「皇道派」和高階的「統制派」，前者認為天皇已被周邊的壞人所包圍而不知民間疾苦，因此欲群起叛變以清君側，廢除內閣讓天皇直接成為希特勒式的軍隊將領。2月26日，21名年青軍官率領超過1400名軍人包圍東京警政署、首相府等機關，並殺害財政部長等人。昭和天皇對此非常生氣，228下午，叛軍首領們宣稱「起義結束」，只要天皇下令賜死，他們就會切腹自殺。天皇拒絕了，他宣稱這些「暴徒」們不再是他的臣民，也不配獲得天皇詔令，叛軍們於是宣布將奮戰到底，讓後世來評斷他們的清白和忠誠。當天黃昏，一場激戰之後，這21名年青軍官面向皇宮噙淚齊唱日本國歌，兩名軍官隆重地切腹自殺，其餘則遭逮捕，並以叛國罪處死。

地描寫中尉把刀刺進腹部後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痛苦過程，評價「這對勇敢、忠貞的武士夫婦如此令人感動，連眾神都為他們哭泣。」《憂國》之後，三島轉而研究神風特攻隊的歷史，以此為題材創作《豐饒之海》四部曲，繼續歌詠為天皇殉身的奉獻情操 (Nathan 1988)。

1966年12月，當石原慎太郎踏上轉捩性的越南之旅時，三島也展開自己的政治實踐：首先，林房雄為他引見了兩名自居為「超國家主義者」的大學生，他們信仰日本的天皇制與民俗，反對戰後民主制度對傳統的侵蝕，打算將主張付諸辦雜誌，取名《爭論》。大受感動的三島乃應允為其寫稿並向其他作家邀稿。1967年4月，他還參加了自衛軍團部的軍事訓練，預備成為一位真正的「武士」。此後三島由紀夫的政治立場逐漸明晰，1968年七月，他在《中央公論》上發表〈文化防衛論〉一文，主張「日本文化是日本人所以為日本人的內涵，而天皇是日本文化唯一的來源和保證；戰後文化將天皇自日本文化中剝除，像一把斷了弦的琴，使『菊花與劍強行被外力分離』，應致力恢復天皇的榮光，予其軍事支配權，從而恢復日本文化的完整性。」同年九月，號召四十位學生經歷嚴格的軍事訓練組成「楯之會」，以修憲、尊皇、反共、改革為主旨，希冀成為「不惜生命保衛天皇、對抗任何否認天皇政治力量的最後一支軍隊。」1970年11月25日，三島由紀夫率領四位「楯之會」學員前往拜訪自衛隊指揮官，他有計畫地命令學員將指揮官綑綁後，要求全體自衛隊團員集合聽他演講。原本計畫發表三十分鐘的演說，卻只講了七分鐘便被台下的鼓譟打斷，三島旋即走向指揮官辦公室切腹自殺，結束了將近四十六年的一生 (Ibid)。

許多年後回想起與三島由紀夫的交誼，石原嘗言「他的行為就政治效果來考量，祇是近乎無謂的慘痛，但他以自殺所披瀝的對於日本社會本質的預言，倒是非常正確的。」(2006:157)可見雖然手段不同，兩人對於當時日本政治的不滿是一致的，亦即皆對戰後日本國家主體性的不完整感到失落，但三島所追尋的是傳統的復興，石原所尋求的卻是依循現代政治自由主義的邏輯追求日本國家主權的

全然獨立。這也反映了兩人的世代差距－在戰爭中成長、求學、甚至曾短暫從軍的三島由紀夫，對於天皇仍懷著戰前派的崇敬；而戰後方成年的石原慎太郎，則繼承了戰後右翼反蘇、反共、重新武裝的觀念。

在石原從政後，兩人曾有兩次就政治實踐之道正面交鋒。事出於1969年，石原慎太郎與京都大學教授高坂正義在對談中批評了自民黨，未久三島由紀夫乃在報端發表公開信，呼籲石原慎太郎應「拿出武士精神死諫<sup>21</sup>」；同年，兩人應雜誌之邀公開對談，當中論及對「死亡」的看法時，出現明顯歧異：

三島：不能為特定之目的而死，應該追求被守護的終極價值。

石原：如果要為了甚麼而死，應該是為了結局本身。

三島：只守護自己是種很卑怯的思想。

石原：不是守護，而是展現。

三島：無法達到自我放棄的思想，絕對是種失敗的思想。

石原：是指「守護自己」這件事嗎？我不能苟同你。唯一不能夠替代的價值便是「自我」，因此當我的存在消失了，萬物也就結束了。自己所展現出來、守護的東西，全是自己的存在，守護自己的存在，便是發揚自己的存在。

三島：人類在決心一死時是為了自認最重要之事捨身，但照你這麼說，你的行動是永遠不會有真的行動的。

石原：當然會有呀！為了守護存在，也可能以死來守護。出仕亦是一種可能，將自我獻身，也是對存在的守護。

(石原慎太郎、三島由紀夫 1969)

<sup>21</sup> 詳見《國家的幻影》第九篇 pp.154-173：〈三島由紀夫給我的公開狀〉。

從這段談話中可以發現，三島與石原慎太郎對於「死亡」概念有著截然的詮釋。對三島而言，真正崇高的美只能是不朽的，是不可能存在於生的世界之中，恰如在《金閣寺》中之語「一隻手觸及永遠，一隻手卻伸向人生，這是永遠不可能的事。」(1995:134) 三島由紀夫的人生觀中存在著各種二元對立：生對立於死和美文學藝術對立於政治，情感對立於行動<sup>22</sup>。故在三島的哲學中，走入現實政治不可能助他實現浪漫的政治理想，他的實踐之道必然須指向死亡，在粉身碎骨中完成壯烈的美之理想。

反之，對石原來說，政治與文學皆仰賴語言，其間沒有對立的危險—「日語裡有個說法叫做『修辭之劍 (*Kuzetsu no to*)，作家和政治家一樣，都要依靠語言來表達。』」(Nathan 2004:177)— 但石原與三島的愛國主義並非完全不可溝通，當三島把日本國魂寄託於天皇之際，石原則關鍵性地將「國家」與「自我」合一。在1999年8月他與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對談中，他描述了個人「情感生活」成形的時刻：

日落時分，我和同學們及一群後備隊員在跑道旁焦急地等待著。突

然，一架戰鬥機飛了過來，緊急著陸，我們都衝到飛機旁幫助受傷的飛

行員下飛機。我曾多次回想起那一天，當時我並不覺得傷心。那是個令

---

<sup>22</sup> 當石原慎太郎決定參選後，三島由紀夫說：「不要把藝術和政治混在一起。如果你參加政治集會後沿著海岸乘車回家，路上有美麗的日落景象，而你讓司機停下車來欣賞車外的美景，那麼你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政治家。」但石原對此說法不以為然，「我對他說，就算當了首相，我也還要去欣賞日落。」石原認為三島由紀夫當時的說法可能也出於部分嫉妒心理(Nathan 2004:184)，但追究三島由紀夫的生命，他對政治行動的想像並非如石原般出仕論政，而是一種英雄式的自我犧牲，這可證於他1966年發表於《爭論》雜誌上的文章〈新年的窘境〉：「……我現在可以聽見人們說：『你說到作“英雄”——如果你完成一本成功的作品，你就成爲一個文學英雄了。』但是依我的看法，用語言去詮釋一個文學英雄，是語文的誤用，英雄只有在與文學相反的另一極端才能找到。」(Nathan 1988:215f) 可見在三島的想像中，「筆」與「劍」定然是分開的，介入政治的唯一方式是活得像個「武士」，而武士在爲天皇效忠的同時也完成了自我實現，自我實現唯一的可能便是決心一死。凡此種種對立，皆判然於石原對文學/政治乃至死/生關係的瞭解。

人激動的時刻，我等待著，心理深刻地感覺到我和國家在一起，就是現在，我仍然覺得如果我死了，國家就會消亡，好像日本就在我體內一樣，我們已經完全融為一體。(ibid:185, 粗體為筆者所加)

既然所有行動皆爲了守護自身之存有，而自身又與國家一體，因此守護自身、即是守護國家，是則進可擁抱生命、擁抱欲望與權力，在終將腐朽的世界中將自我存在發揮至極致；退可爲國殉身，以重於泰山之勢投向死亡。在此信念之下，各種矛盾的質素和個體—集體之間的張力，乃獲得統合。比如說，儘管在文學作品中歌頌青春的浪漫激情，彷彿叛逆者的代言人，個人生活中石原卻是個令孩子們難以靠近的父親(見前註1)；比如說，他一面自命爲「存在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對於個體性的扼殺，但同時又率先參拜靖國神社、撰寫電影劇本歌頌神風特攻隊，無限浪漫化「爲國犧牲」的想像。通過「守護自身」，石原得以睥睨一切；通過「自身即國家」，父權、浪漫、激情、自我犧牲、死得其所、民主、個人自由、社會公平等價值終可相容無縫，於是造就了今日橫眉冷對千夫指，敢爲「全日本皆無人有勇氣作的事！<sup>23</sup>」的強人石原知事。

值得進一步釐清的是，儘管石原時常被外界冠上「法西斯主義者」的稱號，在他與三島由紀夫的對照之中，卻可以發現石原與極右派國家主義者之間仍多所不一致處。相較於三島由紀夫及其所承襲的戰前派右翼對日本傳統的歌詠及依附，守護自我的青年石原對於「共同體」卻顯得懷疑且虛無。從他與三島的對談中，讀者可以觀察到兩人對於「國家」內涵的詮釋與想像並不相似，因此除了武斷地將三島與石原劃歸在光譜的同一端，仍值得在「資本主義」、「法西斯」和「愛國主義」的標籤之間，對石原的思想作一番深入挖掘。在第五章結論中，我們將重新回到「石原是法西斯主義者嗎？」的問題上，再作更仔細的討論。

<sup>23</sup> 2000年8月15日石原慎太郎參拜靖國神社時，讀賣新聞用語。轉引自 Nathan 2004: 185

## 小結

在本章中我們回顧了石原慎太郎成長、崛起於文壇、爾後從政的歷程，並且比較了其與三島由紀夫對於生/死、文學/政治看法的異同，從而發現他以唯我論的人格調和審美式的浪漫愛國主義與務實的權力手腕，兼容文學家與政治家兩種身份。讓我們再藉由以下的年表，回顧石原慎太郎的生平大事及其與日本政治發展的互動：

石原是在何種認識基礎上架構「日本」的內涵？除了同屬右翼的政治人物之外，在石原同時代的作家及知識份子中，還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為日本定位」的努力：一類是三島由紀夫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將日本國魂寄託於天皇制之上，鼓吹傳統文化作為日本的防衛手段；另一位常與石原針鋒相對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則將日本自我認同的「曖昧性」置放於現代化的過程中加以批判，指出日本對於西方的媚合和戰後對於亞洲各國、以及自身侵略者角色的漠然，致使迄今日本的自我認同仍充滿矛盾模糊，夾纏於無法坦然清理的侵略歷史和「似西方但又永遠不能成為西方」的怨懣之間。深富人道關懷的寫作風格與反戰、反核的堅定信念，讓大江在西方世界廣獲喝采，但在面向西方時，他仍不忘宣示自己與中國的莫言、韓國的金芝河等邊陲世界的文人站在一起<sup>24</sup>，都要在普世人道信仰下挑戰地區性的不公平、不正義。

同樣成長於戰爭期間的東京大學教授溝口雄三，則將他的關懷座標放到了中國。溝口雄三曾形容戰敗時「世界曾顛倒了一回」(2000)。在評述二次大戰所遺留的戰爭侵略責任問題時，溝口對於日本的窘境有著比大江健三郎更直指情感核心的評論－他認為日本的二戰侵略行為中滲透了早發資本主義的優越意識，若要謝罪，則立即面臨「是要針對侵略暴行謝罪？還是對明治以來整個現代化的歷

---

<sup>24</sup> 見 1994 年大江健三郎於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致詞，” Japan, the Ambiguous, and Myself.”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94/oe-lecture.html](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94/oe-lecture.html)

程謝罪？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歷史過程就成了對其他國家的罪孽嗎？」的困惑。加以「脫亞入歐」的心願卻換來原爆轟炸投降的屈辱作結，致使日本一直以「受害者」的角度來記憶戰爭，並且將戰敗的復原定位成「再出發」以挑戰歐美，從而也湮埋並否認了加害者的歷史角色。因此日本與中國、日本與亞洲的和解，必須回溯到西洋現代性出現之前尋找，從而創造一個建立在「差異」，而非「優劣」判準之上的史觀，作為共同交流的知識平台 (2001)。站在日本漢學的脈絡中，他更提倡「以中國作為方法，以世界作為目的」來閱讀中國，才能跳脫「反西方」或「反反西方」的對立，在承認世界多元性後重建獨立的日本主體意識。

相較三島由紀夫訴諸天皇制來界定日本本質，或溝口與大江藉由反省日本的現代化歷程為日本在歐亞間定位，石原的政治論述中兩者俱缺席。他以看似自明的愛國主義立場，為口中的「日本」築構出一個不容置疑的先驗維度。從石原的視角看出去，我們將看到甚麼樣的日本現代化過程？在這其中，有著甚麼樣的中國認識？讓我們進入下一章的討論。

### 第三章：政治家石原與冷戰後日本的歐亞游移

在上一章中已介紹了石原慎太郎崛起於文壇後轉入仕途的過程，並且比較了他與同時代知識份子對於日本國家前途的看法，以呈現在戰後日本政治中幾個最關鍵的時代矛盾。在本章中將進一步檢視：石原慎太郎是在何種認識基礎上構築其國族敘事？他的鷹派立場是植基於何種歷史意識之中呢？為呈現其發言位置，在進入其言論之前，將先介紹近代日本在「歐」「亞」間游移的自我認識，從而勾勒出石原外交觀點的歷史意識與流變。

#### 第一節、從退出中國到中國威脅論：近代日本的大國路

自明治維新以降，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始終緊扣著如何在歐亞之間自我定位的困惑。面對以普世文明領導者自居的歐洲，日本思想家必須追問「如何進入西方所定義的普世價值、被承認為進步的一員？」達成目標的其中一條道路是推動日本超越亞洲，亦即從被烙上落後「他者」形象的亞洲中脫穎而出。1885年，福澤諭吉發表著名的《脫亞論》，他擔憂「現今的中國朝鮮對我日本不僅未有絲毫幫助，而且因三國地理相連，在西方人眼中，間或同一視之，或以評價中韓的標準來看日本……為今日計，我國沒有餘裕等待鄰國的開明以共興亞細亞，而應該不與其為伍，與西方文明諸國共進退<sup>25</sup>」福澤的主張為往後日本的現代化意識定下基調，亦即透過制度革新與文化改造，與曾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亞洲鄰國割袍斷義，而戮力成為與歐美平起平坐的「文明」國家。直到戰後，這條思路仍由丸山真男所繼承。

由於日本曾長期隸屬儒家文化圈並幾度進出天朝的朝貢體系，因此多數人同意日本的語言文字與思想深受儒家聖王思想的薰陶。在中國飽受列強侵辱的十九世紀末，「脫離亞洲」的首要工作因而即是切割與中國的關連。大量曾經研習參

<sup>25</sup>又名《惡鄰論》。轉引自山室信一 2005。



悟中國經典的日本知識份子懷著融入普世文明的渴望，乃開創各種學說，試圖證明日本與中國有所差異的歷史認識。要者如東京學派的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師生，藉由模仿歐美知識論來重構中國歷史，從而為日本創造出一個比中國優越、且能與歐美置於平等起源的文明位置，以證稱日本的未來必能超越歐美，進而達到真正的普遍性。亦有排斥東京學派普遍法則的內藤湖南，意圖站在中國的實際歷史中來分析中國，但同樣將日本置放在與中國區隔的歷史脈絡下，擺出由外而內觀察的姿態，繼續以「中國歷史停滯論」和「文化中心移動說」賦予了日本人「拯救、解放『支那』」的正當性。伊藤博文內閣領導甲午戰爭獲勝後，蔑視中國的思想漸成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包括思想家德富蘇峰、元老派政治家大隈重信等人皆目見了日本取代中國成為「文明帶路人」的可能，振筆為日本的擴張侵略、「保全中國」論證正當性<sup>26</sup>；此外也有許多理想主義者參與協助中國的民主革命，希望中日透過同步的政治革新能合作對抗西方侵凌<sup>27</sup>。

相較於知識界的眾聲喧嘩，日本政府的外交戰略則模仿西洋各國的行徑，試圖依樣畫葫蘆地依循現實主義邏輯，擺出一切以擴張國家利益為指導原則的西洋國家姿態。經歷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勝利，並成功佔領台灣、朝鮮後，日本已被捲入列強的侵略競賽中，不再有與中國為友朋的餘地，1915年對中國提出「21條要求」，象徵日本政府選擇將自己擺在在西方侵略者的立場，正式與中國為敵 (Ibid:220)；但由於「進入西方」的不順遂<sup>28</sup>，又遭逢國內不景氣和龐大的發展壓力，表面一律採取現實主義的日本，也能認識到現實主義解決不了身分問題，遂又將焦點轉回亞洲，提出了「大東亞共榮」主張，以「解放亞洲」之名，儼然東亞一體，進而在東亞各地遂行亞洲各國眼中的殖民佔領與經濟剝削。

<sup>26</sup>德富蘇峰提出「文明論」，認為日本是「文明的帶路人」，主張「大日本擴張論」，並認為對清開戰具有正當性。大隈重信認為日本代表東方承襲了西方先進的文明，因此進入「高度文明國家」之林，而無視世界文明的中國，卻面臨亡國的命運，所以需由日本來「保全」。

<sup>27</sup>包括支持並協助中國進行革命的北一輝；支持中國民族運動的尾崎秀實；協助孫文進行革命，並反對日本政府侵略中國的宮崎滔天；主張民本主義和與中國親善的吉野作造等等，可參見王屏 2005，《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或陳秀武 2004，《日本大正時期政治思潮與知識份子研究》。

<sup>28</sup>要者如甲午戰爭之後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以及 1920 年代美國國內的反移民排日運動，都提醒著日本受到西方完全接納的不可能，於是將眼光轉回亞洲。

由以上歷史溯源可以發現，從明治維新至於二次大戰結束之間，日本對於亞洲由「脫亞」而「興亞」再至於「侵亞」的政策轉變，實深受其歐化工程的成敗所牽動，以此並非真是所謂現實主義。亦即日本愈是受到西方排擠，就愈需要強化其於亞洲的歸屬感，好帶著「亞洲第一」的身份來領導亞洲抗衡西方；然由於渴望成為文明大國的「優等生意識」不熄，日本面對亞洲鄰國時便只能複製歐美帝國主義的富國強兵邏輯，渴望歐美的承認，因此無時無刻又存在一種以排除中國來取得西洋身分的誘惑，「亞洲第一」反而變得不相關。

二次大戰之後，即使脫離亞洲與領導亞洲這樣的不確定繼續存在，此種認同困惑在嶄新國際政治格局下也面臨了新的結構條件，因而表現出新的形式。其要點為：

1. 就內涵而言，首先採取經濟大國主義來填充自我認知，追求成為符合西方定義的先進國家；80年代後，隨著經濟地位的竄升，又造成政治大國主義抬頭，尋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稱的外交影響力。

2. 就歷史分期而言，乃是以1989年冷戰終結為分水嶺，冷戰下的日本自視為「西方」之一員，全心全意地學習盟友美國的發展之道；冷戰後雖然仍秉持著同樣的文明目標，但在國際新格局下重新自我定位為「亞洲」之一員，積極與亞洲各國結盟。

二次大戰戰敗後，隨著美國佔領與美蘇對峙格局的確立，日本直接被劃入冷戰話語下的「西方」所管轄，隨著1960年日美安保條約簽訂，政府更全盤接受了美式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向美國全面傾斜(山室信一2005)。1961年，池田內閣上任後提出「所得倍增政策」，預期在十年內使實質國民所得增加為二倍，每年經濟成長率訂為9%，並結合學界、產業界力量，要求採行必要措施以達成目標(許介麟1991：43)。此種經濟成長主義很快轉移了國內「保守/革新」對峙的辯論焦點，使得反省戰爭以及同情左派理想的聲音侷限於學院中，社會黨對於該

政策偏袒大型企業、擴大階級差距的批判亦無法穿透政經優勢結構 (Ibid:46)。但池田內閣所設定的國家目標很快在總體經濟層次上達到了成效：1964年，日本加入 OECD，1968年 GNP 躍為世界排名第二位，到了石油危機爆發的 1973年，全國 GNP 已較 1955年增加了 5.4倍 (山室信一 Ibid)。

日本在石油危機重創世界經濟的 70年代仍能維持傲人成長率的事實，於國內外俱形成深遠影響。淺田彰 (Asada 2000:20f) 便以 1973年為分界，指出日本的公民社會運動在高速經濟成長時代之後趨於瓦解，60年代左派思想促發激越的反美、反資本主義擴張意志已無以為繼，取而代之的是中產階級壯大後的個人主義與政治冷漠。在國際層次，此一受到西方在內各界公認的成就，大大提高日本之聲望，為日本加強與東南亞各國的經貿交往築建利基，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寮國陸續以「向日本學習 (Learn From Japan)」為口號推動經濟發展計畫，強化與日本的經濟關係 (Singh 2002:285)，「雁行理論」應運而生，象徵日本的發展經驗將引領著亞洲諸國成長；同時也為日本提供了雄厚的援外資本。1970年代起日本逐漸增加援助外國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的經費，到了 1980年代不但躍為世界第二大 ODA 輸出國，在亞太地區投入的經費甚至超越美國，成為 ODA 輸出最高額的國家<sup>29</sup>(Grant & Nijman 1997:42)。1979年，哈佛大學教授 Ezra Vogel 甚至以日本的企業經營模式寫成《日本第一》一書，以日本經驗質疑美國模式的未來。

更重要的是，經濟成就讓知識界重新瞥見了日本重登「大國」之林的曙光。由於日本政府深明其外交動作的敏感性<sup>30</sup>，因此早已承諾全力發展「經濟大國」角色，並「保證不成為軍事大國」<sup>31</sup>。然而，這一路線在 80年代中曾根內閣上任後產生質變：1982年 12月，甫上任的中曾根康弘在自民黨內演講時喊出「戰後政治總決

<sup>29</sup>學者們認為日本積極輸出 ODA 的理由，不外乎此舉有助提升自民黨政府在國內外的聲望，同時也提供日本一個更趨開朗、具有國際參與實力的未來圖像，彰顯日本符應西方現代大國標準的實力 (Yasumoto 1989)。然而卓南生也指出，此舉對於提升日本國際形象助益有限，東南亞國家仍慣常感覺日本的經援政策是精打細算的「支票本政策」。

<sup>30</sup> 1974年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在泰國曼谷、印尼雅加達皆遭遇激烈示威，顯示東南亞各國對於日本在戰爭期間的暴行仍有憤怒。

<sup>31</sup> 即著名的「福田主義」，由首相福田起夫 1977年 8月 18日訪問菲律賓時在演說中發表。

算」的口號，要使日本在國際間的政治、外交地位與經濟地位並駕齊驅<sup>32</sup>，日本欲走向「政治大國」的目標已昭然若揭，也引起了中國、韓國與台灣的警覺及抗議。然而此時中曾根內閣的口號是「立足日美同盟、貢獻國際」，並在訪問美國時鼓勵美國「將日本建設成一艘『不沈的航空母艦』，落實日美同盟關係，共同抗蘇」(孫政 2005：232)，顯見此時日本的自我認知是要作一個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政治大國。所謂的「戰後政治總決算」，所意味即是從 1945 年來日本全心全意向美國學習、欲化成文明「大國」之目標終於完成階段性任務，只等著普世文明的「師傅」對其點頭，肯定日本就此躋身「進步大國」之列。

然而，1989 年冷戰的結束，又將戰後日本的發展帶入新處境。冷戰瓦解首先為「日美安保條約」的合理性打上問號，要不要繼續作美國的戰略夥伴？這一同盟面對的戰略對象又是誰？都等待著主政者的重新思索。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理論成為新典範，「文明」與「區域」的概念取代冷戰結構下「自由/共產」世界的區分方式，從自由世界一員被劃歸到「東亞」範疇內的日本，也吹起了「脫美入亞」之風，彷彿重蹈戰前由「脫亞」轉向「興亞」的軌跡，意圖領導東亞各國共抗西方。但曾經睥睨世界經濟的日本卻在 90 年代初期陷入泡沫經濟危機，而一百年前慘遭列強瓜分的中國已逐漸擺脫弱者姿態，以其廣大的市場和廉價豐沛的人力向全球招手，儼然有超越日本成為區域新霸權之勢；這是一個日本所陌生的中國，也是不可能憑藉「大東亞共榮圈」名義將其收編的中國。因此不同於戰前興亞論者將中國視為己身之一部份，尋求共同朝普遍性邁進的態度，1990 年後日本在「重返亞洲」的同時也流行起「中國威脅論<sup>33</sup>」，將中國視為日本在東亞區域競

<sup>32</sup>中曾根的政治改革包括三個方面：1. 財政改革，內涵為放鬆政府管制，擴大國營事業民營化；2. 教育改革，具體內容為加強愛國教育，改變歷史意識；3. 外交政策改革，具體措施即增加防衛經費，突破戰後「禁區」，進而能夠作為「西方一員」以貢獻國際。

<sup>33</sup>發軔於日本防衛大學村井友秀 1990 年發表於《諸君》的文章，以「論中國這個潛在威脅」為題，從軍事實力與綜合國力著眼，指出中國正在重建部隊積極尋求重新成為「霸主」的機會，對於正在走向政治大國之路的日本是個潛在的大威脅。此文引起日本社會極大迴響震撼，一時湧現畏懼中國現代化「要讓中國永遠在技術上落後日本十至十五年」的聲音，也使日本政府重新檢討對中國政策轉向保守。詳見何思慎，2001，「『中國威脅論』與二十一世紀日本對中國政策芻義——以經濟與軍事為中心」

[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2f6/274073eeb7d0a1ef49256ab00025bea4/\\$FILE/hoszushen.pdf](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2f6/274073eeb7d0a1ef49256ab00025bea4/$FILE/hoszushen.pdf)

爭的勁敵。

正是在這種時代氛圍中，石原出版了評論集《可以說 No 的日本》。該書的暢銷和銳利的觀點引起美國各界矚目，也開啓了關於日美關係的一連串討論。在自民黨內屬於福田派閥的石原慎太郎，政治外交立場繼承了中曾根康弘的「保守本流路線」，因此他的國際關係觀點與日本國家主義的自我認知亦交互纏繞呼應。在接下來的兩個小節中，透過閱讀石原慎太郎在各種議題上對於中、美、日關係的發言，將試圖在戰後日本國家認知的脈絡中為其定位。

## 第二節：為何說 No? 向誰說 No? — 石原慎太郎的日美關係觀

從 1989 年至 1995 年之間，石原慎太郎陸續出版了四本政治評論集《可以說 No 的日本》(與新力總裁盛田昭夫合著)、《即使這樣也敢說 No 的日本》(與上智大學教授渡部昇一、軍事評論家小川和久合著)、《日本堅決說 No》(與文藝評論家江藤淳合著)、《亞洲也可以說 No》(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合著)，這一系列作品圍繞著清晰不變的主軸：日本要在外交上擺脫「沈默是金」的服從性，挺身拒絕來自美國的不合理要求。提綱挈領，他對於美國的挑戰包含以下三個面向：

### (一) 美國對日本懷有種族歧視，使日本屈居從屬地位。

從 1980 年代起，日美之間便爲了美日間年年成長的貿易逆差頻生齟齬，美國責怪日本不肯開放市場，透過貿易制裁要脅日本促進貿易平衡，兩國在 1986 年的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更爲了農產品補貼等關鍵議題爭執不休；加以日本企業在美國社會中的存在日益明顯，一股「日本威脅論」在美國社會中蔓延，主張重新評價美日同盟爲美國所創造的利益 (查道炯 2003)。石原慎太郎批評此種心理完全出自種族歧視，使美國不願承認日本在貿易與技術研發上的創意，不珍惜日本對兩國同盟關係的貢獻，而以蠻橫的手段對日本予取予求 (2006:499)。

石原認為，貿易摩擦僅僅是美國對日偏見的例子之一<sup>34</sup>，從軍事分工到在日美安保條約中的形象，石原都為日本抱不平。

我追問：「美國的核子潛艇數目不及蘇聯，因此常受到壓力。為什麼不能讓日本分憂，如果是德國或英國的商船，是否就另當別論？」對方率直地回答說：「如果是他們就可以。」

簡而言之，他們率直地認為：日本是個不能信任的國家……委託日本做這種情蒐工作反而令人擔心害怕，或許委託蘇聯人還比較好呢！我想我們必須覺悟，因為他們內心的種族歧視非常根深蒂固。



(1990:37-38)

石原也抨擊美國輕視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中的付出。「美國積累戰術和戰略經驗所設計出來的軟體，如果沒有日本的半導體晶片，即使輸入電腦也不會運轉。由於日本的技術，使美國減少波斯灣戰爭中的犧牲，無知的美國政治家們說甚麼『日本人沒有流血』，真是太不講理……日本的技術對美國的軍事力量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五角大廈再清楚不過了。」(1992:71)因此，他主張日本應重估日美關係，「日本人不會被他們的軍事威力嚇得發抖，也絕不會再對『日本的貢獻不夠』等無端指責保持沈默。……如果美國人作不到這些，今後的美日關係將難以確定。」(Ibid:73)。

## (二) 日本人應發展出新的自我意識，勇敢參與國際事務

爲了挑戰美國在外交關係中的強硬姿態，石原鼓吹日本要懂得善用手中的王

<sup>34</sup> 石原也曾分別指出美國對日本丟擲原子彈(1990:38)，以及首相田中角榮的洛克希德醜聞(1995:64)，都是美國對日種族歧視的例子。而1990年應該書英譯版發行前往美國宣傳時，石原也在電視節目中直接抨擊美國國內種族歧視的氾濫。

牌——高科技技術，「在能說『No』時就說『No』」（1990:115）以能與美國平起平坐；而更根本的是日本自我意識的改革：

戰後日本一直處於異國文化——美國文化統治之下。從言論限制到憲法，美國在促使與西歐不同的深具特殊性的異己——日本解體……美國對日政治戰略的核心，就是強加給日本一部帶有令世人吃驚的英文註釋的憲法……，現行憲法限制了日本人的國際意識，不正當地損害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正是這部憲法使日本這個國家就像個中國古代的太監，只有陰莖而無睪丸。……

……日本人有個缺點，就是過多地做自我批評，這也可以說是由地勢條件造成的。總是看他人臉色行事，處處都要使他人如意，這樣做是非常被動的。……然而，現在我們國家已經到了應該發揮男子漢作用的時代了。日本在二次大戰後一直追隨著美國，這種日本有史以來最女性化的被動的生存方式應當結束了。(1992:92-95)

石原寫作這段文字的用意，除了抽象地要求日本人能發展獨立意識，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外，亦具體呼應了 90 年代初日本國內對於自衛隊是否出兵海外的辯論。雖然修憲與否是從戰後便縈繞著日本政治的老議題，但歷經 70 年代的經濟成長和 80 年代的中曾根主義洗禮，日本追求成為「正常國家」的意識與合理性已不同於戰後時空下的頹喪，加以蘇聯垮台後東亞地區軍事秩序重新洗牌，日本也趁機摸索在國際事務中的新角色。1990 年自衛隊出兵參與聯合國在柬埔寨的維和行動，首相海部俊樹提出《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法案》為自衛隊出兵建立法源；8 月波斯灣戰爭爆發，總理也提出「中東貢獻論」，意圖追隨美國腳步參與中東安全事務，隔年 4 月更派遣自衛隊海上掃雷艦出航。這一主張也在 1993 年小澤一郎出版的《日本改造計畫》中得到呼應，不同的是當其他政治家仍在「強

化日美同盟、伙伴關係」的底線上發言時，石原已將憲法第九條視為美國所強加的束縛，必須加以掙脫，日本才能走自己的路。

(三) 西方文明已沒落，日本要引領全亞洲發展，抗拒偽善警察國家美國插手。

除了批評美國對於日本的輕視，在 1995 年與印尼總理馬哈地合著的《亞洲也可以說 No》中，石原慎太郎進一步將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相對化，從而預言亞洲的崛起：「亞洲必須向美國的單邊主義說『No』。我相信亞洲的其他國家寄望日本能大聲說話，並且亮出手中的王牌。作為這個地區最強大的國家，日本必須作為楷模，與華盛頓平等對談。」(1995:58-65)

石原抨擊美國是偽善的警察國家，不顧國內的種族歧視盛行、犯罪率高升、貧富差距，而以人權警察之姿四處干預 (Ibid:99f)，其下的驅力則是以一神論為基礎的基督教，使西方擴張主義徹底缺乏容忍精神 (Ibid:93)。反之，亞洲的文化是以容忍、尊重多元為基礎，而且強調「和諧」，要求小我與大我相互配合，亞洲的世紀必將是和平共存的時代 (Ibid:93-95)。

重要的是，這個亞洲的世紀將由日本所引導，共抗歐美：

超過一世紀以來，日本一直勤奮地吸收西方文明，如此專注一意而幾乎遺忘了我們也是亞洲的一份子。我們是歐美的好學生，也在某些領域表現特出，但在心底我們還是非常貼近亞洲。文化的相互模仿是歷史進步的驅力……就像亞洲人曾經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啟發，歐洲與北美將再次地向東方學習智慧。

(Ibid:89-92)

綜合以上三點，從石原慎太郎對於美國的批評中，他欲證明的是：日本不



但經濟實力足以與歐美並駕齊驅，成為現代化的模範生，相較於言行不一的美國，日本甚至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資格帶著殊異於西方文化價值的亞洲來稱霸世界。很顯然地，石原對於「美國」所象徵的價值體系並沒有挑戰或否定之意，也並非懷著戰爭的傷痕情緒尋求報復；石原批評美國，總是為了凸顯日本從明治以來幾度進入西方之路的不順遂，並發抒日本無法成為「正常國家」的創傷。

然而，在石原期期扛起亞洲抗衡歐美的同時，隔鄰的中國也不再是百年前的東亞病夫，而以蓄勢待發之姿與日本競逐著亞太地區的領導權，因此單是挑戰西方尚不足以證成日本的文明大國地位，更要對崛起中的中國有所評價。以下就進入石原對於中國的評論，以完整其國族敘事的兩面。

### 第三節：永遠的「惡鄰」－石原慎太郎眼中的中國。

儘管是偵測並緊緊依隨著美國的脚步，日本早在 1972 年就趕在美國之先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之後便與中國建立密切經貿關係。1980 年代中曾根內閣上台後，其政治大國主義為兩國外交製造許多摩擦，包括戰爭責任問題、二次大戰歷史認定問題、主權與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等，都成為兩國關係中的地雷區。政治上的溝通差距與經濟的熱絡來往，為兩國政治關係營造了高度張力。在這些議題上，石原都曾提出右翼立場鮮明的發言或政治行動。以下根據發言時序與議題，一一列舉。

#### (一) 青嵐會時期堅決反共

由於不滿田中角榮首相與中共建交，1973 年石原即刻邀集了參眾兩院三十一位議員，以血盟組成政團「青嵐會」。在對外說明青嵐會成立緣由以及血盟的意義時，石原慎太郎以「神風特攻隊」自比，指出必要時將拿出忘我精神，為國家

犧牲；另一位成員渡邊美智雄更直指其首要敵人便是共產主義—「青嵐會必須與共產主義決一死戰，否則自民黨終將趨向滅亡」(聯合報 1973a)。青嵐會一成立，便組團前往台灣訪問(聯合報 1973b)，以與同時訪問北韓的自民黨議員團互別苗頭；此外也與台灣在日推動對日外交的關係組織「日華議員懇談會」往來密切，定期聚會。而該組織成立未久，適逢內閣正與中國開始研議「日中航權協定」，安排兩國互惠開放領空。青嵐會對此議案極力杯葛，在國會中以扔煙灰缸、掀桌等動作暴力抗議，輿論界頓時將青嵐會與 30 年代發動「二二六事件」、「五一五事件」的極右派青年政治社團相提並論(卓南生 2006:14f)。

## (二) 對二次大戰的認知

1980 年代起，隨著經濟成長帶來的民族自信高漲，日本國內右翼檢討「大東亞戰爭」評價的意識也愈漸抬頭。在朝有中曾根首相的一連串教育改革爭議<sup>35</sup>和「藤尾妄言事件」<sup>36</sup>，中曾根康弘更開先例成為戰後首位參拜靖國神社者的首相；在野則有一連串的右翼運動。在這股重新評價二戰責任的潮流中，石原慎太郎的發言也不讓曾為青嵐會同志的藤尾正行專美於前。1990 年，在接受美國雜誌「花花公子」專訪時，石原表示「南京屠殺是中國人捏造出來的謊言」，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國際輿論反彈，不但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在美的華裔歷史學者亦發表聯名公開信，舉證反駁石原(陳世昌 1990)。

當選東京都知事後，石原又施壓東京市內的中小學應採用「新版歷史教科書」，並強制市內公立殘障學校首先使用該版本的教材，此舉也引起民間反戰派強烈抗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甚至遭人縱火(田思宜 2001)。另外，自從 2000

<sup>35</sup> 中曾根內閣的教育改革乃是以「激發愛國情操、消弭個人主義」為宗旨，表現於施政卻形成對教科書的修改和二戰歷史評價的重估。1982 年文部省介入中小學教科書的用語，要求將有關日本對外「侵略」的描述一律改為「進出」或「侵入」，「佔領」改為「派遣」，對天皇一律使用敬語，刪除南京大屠殺一節，改寫為「引起中國人劇烈反抗，日軍亦死傷可觀」等，凡此種種皆引起中國、韓國紛紛抗議(孫政 2005:225)

<sup>36</sup> 曾為青嵐會一員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又在 1986 年 7 月 25 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然發表否定東京審判、否認侵略歷史，他表示：「有的是對方國家認可的了」，暗指當年日本對於朝鮮的併吞乃是當時朝鮮政權所認可，而非侵略(Ibid:241)；8 月 6 日，又說「不認為東京審判是正當的。」

年 8 月 15 日首次參拜靖國神社之後，石原也年年都在戰敗紀念日率領右翼團體前往，每一次都引起反戰人士與右翼支持者的劇烈衝突 (董更生 2001)；2004 年 8 月，他發表給天皇的公開信，呼籲天皇參拜靖國神社，作為一國元首的天皇若能帶頭參拜靖國神社，可激發日本人的愛國心，整頓士氣，更可讓鄰國拿日本沒辦法。」2006 年，石原更以「神風特攻隊」為題材撰寫電影劇本，取名「我為你赴死」，消息一出更是引起中韓兩國矚目與反感，深恐本片傳達的史觀再次浪漫化日本侵略歷史、煽動民族主義 (黃菁菁 2007)。

歸納石原慎太郎一路以來關於日本在二戰中功過評價的發言，不管是南京大屠殺懷疑論、要求採用「反自虐史觀」教科書、或是歌頌為國捐軀者，核心認識無非為「日本也是西方侵略下的受害者」。1990 年接受花花公子訪問時，在脫口而出「南京大屠殺虛構論」之前，他所欲談論的其實是日本的原爆災難經驗：

問：在你的書中<sup>37</sup>，為了證明美國對日本有種族歧視，你引用美國在大

戰時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而非對德國人。但當德國人宣布投降時還

沒有原子彈……

答：我祇是把幾乎所有人心裡的話大聲地說出來罷了，這是我們大多數

人的真正感受：也許這會讓你們美國人聽起來不舒服。

問：但這並非事實。

答：一般而言，美國人並不知道原子彈炸死多少人，也不曉得死於核戰

後遺症的人有多少，每次提到這點，美國人就會反過來說「日本人

攻擊珍珠港」。

---

<sup>37</sup> 指當時正要發表英譯版，然盜版已經隨著美國五角大廈翻譯而流傳的《可以說 No 的日本》(A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書。

問：難道日本的過去作為就不殘酷嗎？中日戰爭期間所發生難以置信的

大屠殺，你又怎麼說？


答：手槍機槍怎麼能和原子武器相提並論？它們不是一回事。我們日本

人作了甚麼？在哪裡發生過大屠殺？

問：只舉一個例子，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十萬以上的中國百姓被殺。

答：人們都說日本幹下大屠殺，但這並不正確。這是中國人編出來的

謊言；一直要污辱日本的形象。但這是騙人的謊言。



這段訪談的推進中，可以發現日本右翼談論二戰經驗的典型論法：一方面「虛幻化」南京大屠殺的死傷數字甚或真實性，一方面控訴美國加諸於日本土壤上的傷害；前者是大東亞共榮圈面對西方在其內部進行的自我砥勵與自我犧牲，後者是由日本單獨承擔大東亞共榮圈之後的責任負擔。這種態度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清楚地呈現：「我不是完全否定大屠殺的事實，我祇是說從許多權威資料來看，很希望把受難者的具體數字改為二萬六七千人這個準確數字，或進行重新調查。哪怕是這個數字的十分之一還是百分之一，肆意殺人終究是不人道的，屠殺就是屠殺，但是30萬人這個天文數字則完全是虛構。在美國，有人公開胡說八道，說甚麼『日本人在中國殺了30萬人，挨兩顆原子彈是罪有應得。』美國人至今不知道兩顆原子彈究竟使多少日本人死於非命。」(1992:47-48) 石原一面對中國說「不是要否認屠殺，但中國真的沒有死這麼多人」，另一面提醒美國「日本爲了大東亞戰爭犧牲了更多人」，這是以受害者的姿態卸責，不願正面面對中國，擔負起加害者的責任；而在詮釋侵略歷史時，石原採取了「自衛論」——「由於在歐洲近代主義的原理只有一項，那是要搶奪殖民地，或被搶奪為殖民地的二選一的帝國主義之力學而已。日本就在目睹發生於亞洲的鄰近各國被歐洲列強殖民地化

的慘況，為了避免日本也被殖民地化，戰勝清國、俄國，而擠進列強之一。但是日本也誤入帝國主義這一當時的歷史原理，官兵變成強盜，自己也朝向殖民地而邁進。」(2006:496) 言談中充滿「身不由己」的意味，主張日本是在有限的選擇中為自保而向外侵略。當然可以批評這樣的想法也是缺乏獨立性的，是「躲在歐美的陰影裡的詭辯術」(溝口雄三 1999)，但這樣的剖白更幫助我們瞭解了日本至今難就戰爭侵略全盤道歉之情感癥結：如果向外侵略是日本因為不能成為西方，以至於必須回到亞洲才能取得行動身分，完成現代化進程，那麼就戰爭侵略向其他東亞國家道歉，不就否定了東亞做為一體，也就否定了推動整個現代化過程的主體價值？

溝口雄三曾指出：日本右翼傾向採取「受害者」的單面向來記憶戰爭體驗，而淡忘「加害者」的角色，畢竟用受害者的姿態維持控訴的正當性是遠比作為悔過的加害者輕易多了(2001)。此發展與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接收日本、保留天皇制而免於戰爭反省的歷史有深刻聯繫，右翼史觀將太平洋戰爭看作是「日本帶領亞洲、對抗西方」的「有色人種對抗西方殖民者」，原爆的屈辱因此不只是日本民族的屈辱，同時也彷彿是日本「為了全亞洲」而概括承受的重創。而由於麥克阿瑟佔領日本後並未對裕仁天皇的戰爭罪責多加處理，甚至在韓戰後積極扶植日本右派、打擊左派，這些政治現實俱卸除了右翼國家主義者反省戰爭真實責任的壓力和需要，也使得其國家觀點在戰後仍隱晦地保存下來(小森陽一 2004)。對於與石原分享著相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者來說，日本在二次大戰中已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受害國在日本的快速繁榮中始終沒能得到真正的寬慰，因此「南京大屠殺」之於中國人永遠是一個不斷生產仇恨與憤懣的記憶機器(溝口雄三 Ibid)，但此般情感鴻溝卻使得和解之路愈加迢遙。

### (三) 冷戰後的中國威脅論

在 1989 年之前，石原對於中國最主要的批判就是在「反共」陣線上發揮，隨著冷戰瓦解與中國大陸經改開放，「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的二分法頓時失去意義。此後，石原慎太郎於是採取不同修辭將中國描述成世界安全與繁榮的威脅者，對內要求日本與中國審慎來往，對外呼籲美國與亞洲諸國共同提防。具體的觀點包括下列幾項：

1. 批判中共專制統治，預言中國崩潰

1995 年在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合著的 "The Voice of Asia" 中，他首先批判北京政府對於天安門學生運動的鎮壓，接著預言市場的開放將為專制政體帶來多重衝擊：不均等的經濟分配將迫使族群意識上升，要求自治；而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洗禮的東南沿海，也將逸出北京的高壓掌控。隨著北京當局的影響力減弱，中國將由集權國家分散為多族共和，並融入日本所領導的大東亞經濟圈中 (Ishihara and Mahathir 1995: 142-143)。2002 年 6 月的日美商會上，石原再次預測中國在十幾年後必將分裂成數個小國家。

2. 中國是核武持有國，日本應與美國聯手制衡其侵略擴張。

石原慎太郎曾經多次向國際指控中國軍事擴張，包括 2000 年 8 月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時稱「中國是最大的威脅」；2001 年 9 月訪問美國時，指責中國企圖在亞洲建立「擴張帝國」，支配整個亞洲地區；2005 年 11 月再訪華盛頓，石原在演說中表示「美中若開戰，美國必敗」，因為「戰爭歸根究底即是生命的消耗，但中國沒有尊重生命的價值觀，而有著公民社會的美國則仍仰賴公民決定，因此一但進入消耗戰，必定不敵中國。」因此石原主張美國應該對中國採取經濟封鎖，以遏止其軍事擴張。最後石原尚強調中國可能發動核戰：「美中之間若有紛爭，中國勢必想除掉最礙眼的美日安保體制，到時候中國的核子彈不是落在琉球，就是對準東京吧！<sup>38</sup>」

<sup>38</sup> 發言皆轉引自中國時報 2005/11/11 報導，「石原：中國可能發動核戰」，另外石原的詳細論證可參見 2005/12/05《產經新聞》文章：「アメリカは勝てまい」（美國必敗）  
<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42.html>

### 3. 移民、盜版威脅日本內政與智財權

不僅中國政府是威脅製造者，石原眼中的中國人也象徵著對日本安全福祉的另一類威脅。繼 2000 年的歧視「三國人」言論引起國際關切後，2003 年 8 月 4 日石原慎太郎又發表文章〈昔遣唐使，今不法入國者〉<sup>39</sup>，譴責非法中國移民形成東京市治安問題，犯下偷盜、非法打工等罪，又盜版日本的文化商品牟利，侵犯日人的智慧財產權；石原因此主張日本政府需要更積極管理的移民政策來抑制非法移民。

隨著這一連串「中國威脅」論述的發表，連帶還呈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便是石原對於美國態度的轉變。在石原積極向美國「說不」的時期裡，除了零星向中國表達抗議的舉動之外，石原甚少將中國描繪為區域安全的威脅者；但隨著 1997 之後中國崛起為區域霸主的態勢愈趨明確，石原對美國的態度也由挑釁逐漸修正為強調日美同盟關係、要求共同防堵中國崛起的基調。石原對美態度的轉變並非特例，事實上，他的轉向還反映了日本知識界面對新國際局勢的不知所措<sup>40</sup>：雖然冷戰結束讓原就不對等的日美同盟關係更加值得質疑，但隨著中日韓間的歷史傷口重新掀開，而中國崛起和國內泡沫經濟又形成鮮明對照，危機意識驟升的日本不能不繼續追隨美國，外交的迴旋空間因而受到壓縮。就地緣政治來說，日本離不開東亞，因而必須設法和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但歷史仇恨尚未化解，新的競爭關係則已展開，於是除了以「中國威脅論」來投射對中國的敵意想像外，也只好繼續依附美國，甚至寄望日美同盟能夠與崛起中的中國抗衡。

#### (四) 主權問題與中國正面交鋒

<sup>39</sup> 參見石原慎太郎官方網站：<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14.html>

<sup>40</sup> 早在 1992 年，Kishore Mahbuban 便以「漂浮外交」形容日本浮盪在中美之間的兩難之境（“Japan A Drift”, *Foreign Policy* 88:126-144）；另外關於日本因為擔心東亞權力平衡發生變動而希望加強日美同盟關係的剖析，可參見 Yoichi Funabashi. 1998. “Tokyo’s Depression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77(6): 26-36. 以及 Wu Xinbo. 2000.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arily Watching One Another.” *Asian Survey* 40(2): 306

爲了凸顯日本在亞洲的地位，石原動輒在主權問題和領土問題上與中國正面衝突，製造緊張。1999年4月當選東京都知事後，石原即在媒體訪問中就西藏人權問題、台海兩岸問題對中國大肆批評，引發中國不悅。1999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石原即在11月來台訪問，成爲1972年中日建交後前來台灣訪問層級最高的日本官員，期間石原直言「台灣是一個國家」，引起中共抗議，憤指其「挑釁中國主權」，最後日本內閣只能以「個人行爲」向中國致歉。2000年3月李登輝卸任總統職務，石原慎太郎與自民黨議員村上正邦籌組委員會邀請其訪日，再度引起中共關切(陳世昌 2000a)；4月，達賴喇嘛訪問日本，石原慎太郎也計畫與其座談，再次造成中國大動作施壓(陳世昌 2000b)。2006年，在產經新聞上發表的〈自由台灣的存在意義〉一文，石原再次批判中國對於台灣與西藏的壓迫，呼籲東亞各國應「共同維護台灣的獨立性，以保障亞洲的安定。

在中日間敏感的主權問題上，石原也頻頻有動作。包括自1978年，石原慎太郎與青嵐會成員發起了日本方面的首次「保釣」行動，募集了十幾位大學生到釣魚台島的東南方蓋了一座燈塔；1997年5月亦有類似行動。2005年5月，在中國爆發激烈反日暴動之際，石原與民主黨議員枝野幸男共同要求日本政府派駐自衛隊至釣魚台維護主權(陳世昌 2005)，並且在5月25日帶著國旗駕船登上東京東南方一千多公里，具有戰略價值的「沖之鳥礁」，在島上揮舞國旗、親吻土地<sup>41</sup>。6月，石原慎太郎在公開談話中繼續向日本政府施壓，鼓吹若中國侵犯釣魚台主權，日本政府應不惜發動一場「國土保衛戰」(人民網 2007)。凡此種種言論都屢屢引起中國的不滿與抗議。

##### (五) 親台北、遠北京的城市外交

1999年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後，即在訪談中透露親台北遠北京的政

<sup>41</sup> 可參見 2005/06/06 發表於產經新聞的評論「沖ノ鳥島の戰略的意味」  
<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36.html>，石原在文中詳細說明了沖之鳥礁之於日本的戰略意義，呼籲日本政府拿出魄力捍衛主權，防止中國在西太平洋擴張軍力。



治立場，不但透露「我與李登輝總統是好朋友，必要的話我會考慮訪問台北」，同時表示「中國大陸對人權和西藏問題的立場，讓我不喜歡目前的『中國』當局。東京與北京的都市交流不需要中止，但如果一定要派人參加，我將會指派副知事前往。(陳世昌 1999)」而他也說到做到，在當年 11 月便訪問了台灣慰問 921 大地震災情，但同一年東京北京姊妹市締交的 20 週年慶，卻僅派副知事前往致意。總計從 1999 年上任東京都知事迄今，石原慎太郎至少前來台灣五次之多，但卻從未訪問北京，引起北京市市長在 2005 年訪問日本時抱怨：「他既不來北京，也不招待我訪問東京，損害日中之間地方的友好基礎。」(中國評論新聞網 2005)

2000 年，石原慎太郎與三個亞洲城市共同發起了「亞洲主要都市網」，促進亞太地區主要城市之間的交流，這可以視為延續石原建構亞洲以面對美國的努力，因此即使石原不屑與中國往來，仍認識到北京的參與不可或缺。但 2004 年年會時台北與北京爭奪 2005 年主辦權，實則在石原的籌謀之下，造成北京不滿的協議結果，拒絕簽署共同聲明「雅加達宣言」，於是退出主辦。北京退出後，石原積極協調台北提前主辦，於是台北將原訂於 2006 年秋天舉辦的第六屆年會提前至該年 4 月舉行，會員國於是在台北開了一場沒有北京的亞洲城市大會<sup>42</sup>。石原對於北京的缺席僅表示「非常遺憾」，中國媒體則直指北京的缺席是石原基於親台立場的「陰謀」。

## 小結

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中曾指出：「近代日本人的國際觀是在『東洋對西洋、文明對野蠻』的框架內形成的。在按道德畫線時，日本把自己劃歸為東洋。在按文明畫線時，日本又把自己劃歸為西洋。」(2005:217) 總結石原慎太郎的

<sup>42</sup> 儘管成功排除了北京的參與，但台北市長馬英九在北京宣布退出後以「缺乏預算」和「沒有權利」為理由，婉拒在 2005 年九月提前舉辦大會的提議，仍不符合石原的期待。訪談對象之一，石原的密友彭榮次乃指出，石原從此對馬英九「非常失望」(2007 訪談記錄一)。

發言，這樣的困惑依然存在。儘管石原慎太郎對美國與中國都有所批判，但兩者作為對日本的「威脅」，意義迥然不同：石原口中的美國是一個蠻橫的壓迫者，以偽善的世界警察姿態四處干涉，而日本明明有能力與之平起平坐，卻又因膚色之故受盡歧視，因此必得加以譴責，並以亞洲特有的文明價值來聲稱日本比美國更優越，從而與之競逐普遍霸權地位。相對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後的、反人權的、不遵守文明世界遊戲規則的麻煩製造者，同時又是亞洲安全的威脅者，因此日本不時以文明承載者的姿態對中國指指點點，甚至提醒軍事同盟的美國一起防範中國。石原想帶著亞洲對抗西方，是複製戰前日本由「脫亞」而「興亞」的圖式，遮掩其不被美國平等接納的狀態；但當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的預言蔓延，甚而與日本競逐區域霸主，石原又必須拉著日美同盟的力量來箝制中國，從而強調其比中國更優越、更符應現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對於中國的抗拒中，透露出日本依違在歐亞之間，無家可歸的困窘。從戰前的帝國主義歧路到戰後的經濟大國路線，日本的國家主義是追隨著西方文明的普世價值而亦步亦趨發展起來；設若經歷共產革命、並且不願接受民主體制的中國能夠被世界所接納，等於否定日本過去以「文明化」為唯一標準的發展軌跡，也否定以亞洲一體爭取與西方評等的願望。這樣的兩難之境無巧不巧地揭露了石原愛國論述的罩門：由於石原選擇以現代化、文明化的程度來填充日本的主體內涵，這使他的國家主義論述失去了任何西方意識形態加以挑戰的效力，而只能緊追著美國的腳步和美國所設置的標準，來界定日本的策略。正如酒井直樹 (Naoki Sakai 1997:157) 在分析戰後日本發展經驗時所指出的，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存在著互為表裡、相互形塑證成的關係，戰後日本對於現代性的追求，其實是以日本的「美國化」為目標，因此既已無力對日本的發展模式提出反省，那麼即便選擇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義形式來批判美國，最終卻只是再次確認美國價值的優越性，也強化了日本的無力感。

不同於戰前脫亞論者的是，一百年前的中國是隨時可能瓦解的弱者，石原

所面對的中國卻是一個令戰後日本知識界滿懷愧疚的對象，也是一個早已走出自己「特色」的新中國，以致將其收編入大東亞共榮圈的可能性已不存，只好將其描繪為野蠻的流氓國家，或是隨時可能崩潰的脆弱政體。因此石原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期待論」為追求日本現代大國身分的一體兩面，一面警告著中國對於日本地位的潛在威脅，一面卻又預言著中國現存體制的必然崩解。如同戰前思想家面對中國時的往返思辨一般，石原時而以「亞洲第一」的想像對抗西方，時而又在西方的陰影下檢舉中國的不合規範；離開亞洲，日本似乎不值得西方尊重，但建構亞洲，日本又似乎無法處理獨自崛起的中國。面對著難以定位的中國，日本在歐亞間的漂流依然迷航。



## 第四章 從日本面對中國：海峽兩岸的石原情結

在上一章中介紹了石原慎太郎對於美國與中國的看法，並主張他對於兩者的分別批判乃繼承戰前右翼的問題意識，尋求在「歐」「亞」兩種文明象徵間築就日本的超然地位。而石原對於中國的批判不僅僅在日本具有影響力，在政治僵峙的中國與台灣，石原鮮明不倚的立場亦吸引著知識界及政界對其表示支持或反對。言者縱或無心，聽者往往有意。不論是批判、挪用或讚許，都促成了「石原慎太郎現象」的風靡，甚至，在針對石原的「抵抗」與「引用」並進下，石原慎太郎所代表的不再僅只是他本人，而是纏繞在日中台百年之間的情感掙扎，召喚著各方發言，是謂作者已死。本章將藉整理兩岸各界對於石原慎太郎的評論，指出石原的論述如何參與著海峽兩岸認同政治的互動；作到這一步後，亦要揭露盤據在台灣與日本上空的話語結構，俾能瞭解：究竟是何種感知結構，使愛憎石原者在同一平面上相遇。

### 第一節、異口同聲齊說「No」：海峽兩岸對石原的挪用

1996年，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在即，而台灣因首次總統直選掀起兩岸緊張的詭譎氣氛中，兩本以「說不」為號召的小書分別在中國與台灣出版：在中國由五位1960年代出生的文字工作者<sup>43</sup>合寫《中國可以說不》，在台灣則由1965年出生的自由作家柯瑞明發表《台灣可以說不》。兩部作品的作者皆非政治人物或學者，而為民間的文字工作者，兩書所引起矚目的程度則不一<sup>44</sup>。雖然訴說的對象不同，

<sup>43</sup> 五位作者分別為：宋強，1964年生，記者；張藏藏，1964年生，出版業者，據說也是本書策劃者；喬邊，1959年生，詩人；湯正宇，1968年生，記者；古清生，1956年生，自由撰稿人。

<sup>44</sup> 根據「聯合知識庫」的查詢結果，在19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間以「中國可以說不」為關鍵字搜尋可得到34筆結果，而「台灣可以說不」則僅有1筆，且並非針對柯瑞明之書的討論。《中國可以說不》不僅在中國國內暢銷，使出版續集《中國還是能說不》成為可能，更引起美、日、德、英以及台灣媒體的關注，石原慎太郎亦為文批評。相對於《中國可以說不》引發的矚目，《台灣可以說不》則幾乎未引起任何注意。

兩書卻有著共通的目標：批判外國干預，呼籲本土社會振衰起蔽。以下便簡單介紹兩書中代表性的論述。

先談《中國可以說不》。本書由五位作者一人一章組成，卷首書明「這不是一份民族主義宣言，也不是確定中國在國際政治中位置的戰略大綱……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1996:前言)大部分的內容都在控訴美國對於中國的文化、經濟和政治入侵，尤其厲聲譴責美國插手介入台灣與中國事務，間或也批判日本隨美國起舞，加入牽制中國的行列。該書落筆的前提正是 1995 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中共發動武裝演習、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的互動，因此除了痛批美國從人權、經貿、到軍事各方面對於中國的牽制之外，也有相當篇幅嚴詞譴責美國「介入中國內政」、「支持台獨勢力」。總括而言，該書的主旨可分為三項：1. 批判美國霸權，鼓吹中國讀者走出「親美」情結，恢復民族自尊；2. 譴責日美安保條約圍堵中國；3. 反對台灣獨立。

《中國可以說不》出版後的效應遠超過五位作者所預期。原本只是抓準 1993 年中國申辦奧運後社會的不滿情緒而以商業動機策劃的書籍，孰料竟被中共中宣部認為是本「愛國」的書籍，通令全國機關購買；隨後又引起國際矚目，美國政府透過北京大使館表示願意招待未出過國的作者群前往美國，以瞭解美國實況是否如作者們所批評般的「腐朽」、「庸俗」、「好逸惡勞」。雖然該書引起的國際政治效應超出作者們所預期，半年後，作者群仍以更加辛辣的語調推出續集《中國還是能說不》，這回矛頭對準了作者眼中的「彈丸之國」—日本。

《中國還是能說不》延續《中國可以說不》的基調，痛批美日帝國主義以及台獨勢力，並收錄新加坡、美國、香港、日本、德國等地主要媒體對於該書的評論或是專訪作者群的文稿，此外還特闢〈天朝與彈丸〉一章闡述作者群對於中日關係的看法，直批石原慎太郎為首的日本右翼史觀。由於石原慎太郎在《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問世後曾發表〈暴露出霸權主義的「自以為是」〉和〈片面的言行是歷史錯誤〉

兩篇文章反駁該書諸論點<sup>45</sup>，作者們也以激憤的口吻和充滿性無能暗示的語言回敬石原一

「讓我們試想一下，在我們認同了石原先生的歷史觀後，會出現甚麼可能的後果吧：

既然您認為日本那時候『進入』中國是一種正確的、必須的、旨在消除西方威脅而且從內心深處是為了東亞共榮的慈善舉動——不要老是盯著日本士兵那些殺人放火、強姦老幼婦女的細節不放，戰爭又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作文章，沒有那麼多的溫良恭謙讓嘛——如果日本在不久的將來被中國認定構成了對中國的威脅，抑或有外國勢力在壓迫日本並試圖借日本這塊跳板進入中國，中國軍隊是否也可以大規模地『進出』日本？是否也可以讓我們那些神經緊張、勞苦功高的士兵們在日本女性的身體上放鬆放鬆？——五十年前，貴國的士兵在我國就是這麼幹的。唉，再設想下去就太恐怖了：如果那些日本女性中恰巧有一位就是閣下您的寶貴孫女呢（您必須在場，不准閉上眼睛——日本士兵在中國也這麼幹過）？如果您秉持自己的一貫的歷史觀（而不是一種種族主義歷史觀），您應該淡然而笑，悠然而道：『歷史就是這樣的……』

您的歷史觀是『可恥的而且無力地抽搐的歷史觀』，精蟲甚少，多半還是死的。頂頂樂觀的估計是，即使您播下的龍種，收穫的也只能是跳蚤了。」（1997: 103-104）

本段文字中最引人悚慄之處恐怕不是各種性侮辱的語言，而是其下「恨不能以牙還牙」的心態，所有的指控凍結在中日交戰的歷史創傷上，日本帝國主義的槍砲一如陽具，在陰性化的中國肉體上留下永恆的凌辱。因此五位男性作者們不

<sup>45</sup> 總結石原這兩篇文章，不外再次拿出中國在西藏和台灣問題上的處理，指責中國是霸權主義以及亞洲的威脅，與五位作者之間毫無對話餘地。

能不激憤，不能不幻想對日本以眼還眼，幻想具有同等強暴的實力使日本也陰性化，從而在日本的土地潑灑下真正的「龍種<sup>46</sup>」。

此處，日中之間和解的壁壘以最最赤裸的情緒呈現。對於五位年輕的中國作者而言，中美之間的關係畢竟是文明間的爭霸，因此各種箝制、干涉都尚能找到理由解釋；但曾經臣屬於其朝貢體系的日本，不但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甚且跟著西方各國一起侵略中國領土，這是情感與理智都無法接受的創傷與恥辱。但對日本來說，明治維新後的歷史發展從來都被軍國領袖塑造為一個關乎現代化挑戰、關乎免於殖民的命題，因此戰前在亞洲的殖民和對中國的侵略，都被石原解釋為日本自身逃避殖民的非預期性後果；加上戰後日本選擇以受害者的姿態片面詮釋戰爭，也就更難坦然解釋過往加諸在中國之上的暴行。幾位作者對於日本的指控充斥著「忘恩負義」、「倚小賣小」、「欺凌兄長」等立基於親殊血緣關係的語言，仍然是從儒家文化圈的歷史觀點向日本發言。但對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國家主義者而言，日中之間的文化聯繫早已是過去式，橫亘於兩者間的不僅是難以冰釋的情感，更是無從對話的歷史體驗。

台灣問題的意義亦如是。五位作者對於兩岸分治的現象並不敏感，動輒以「中國的私處」比擬台灣從而拒斥美日插手，其歷史認識彷彿仍停留在甲午戰敗之際，強硬口吻下反映著被剝奪的創傷。如果軍國日本的侵略史是近代中國自卑感的源頭，台灣不啻是各種外侮與內戰歷史創傷交錯的疤痕，故唯有台灣回歸中國，歷史的債務才得以勾銷。但對於《台灣可以說不》的作者柯瑞明來說，這毋寧是中國一廂情願的想像——

「有一個幽靈漂浮在台灣的上空，這就是帝國主義。台灣人要自己站起來之前，必須跨過三座帝國主義的大山。說的正確一點，美國、日本對台灣所實行的是新殖民主義政策，而中國則是徹徹底底的霸權帝國……老世代因為文化因素而崇

<sup>46</sup>「天朝」和「龍子龍孫」的意象貫穿了《中國再次還是能說不》全書，用以諷刺日本的不正統、缺乏實力，也強調中國必將再起恢復「天朝」光輝。也正是這種男性中心的觀點，使五位中國作者急於挑戰石原慎太郎的男性氣概，以性無能的侮辱語言作為攻擊武器。

日，中世代因為政治因素而恐中，新世代因為文化因素而媚美。因此，《台灣可以說不》要提出必須進行台灣大眾民族主義的鬥爭，對外鬥爭帝國主義，對內鬥爭統治集團的壓迫。

台灣人不會再坐以待斃，與其坐著等死，不如站起來拼命。讓歷史告訴未來，不必懼怕中國武力犯台。中國武力犯台正是台灣人展現意志時刻的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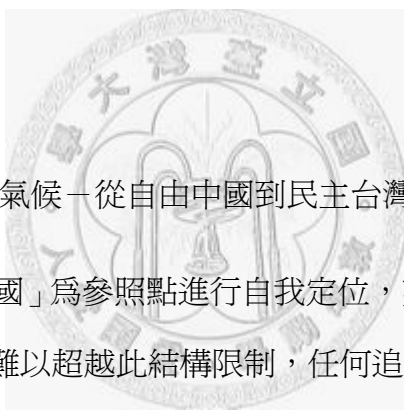
(1996：前言)

《台灣可以說不》的出版幾乎未曾在書市引起任何討論。究其原因，除了作者的籍籍無名和寫作內容缺乏新意外，另一個重要理由可能是台灣根本不具備說「不」的空間。作者對台灣夾處在中、日、美角力間的指陳固有其現實性，但對於90年代急於與中國劃清界線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向日、美靠攏以制衡中國乃是其不變的外交方針；在理想層次上，正因為這三股勢力的交錯已深深銘刻在台灣歷史基體中，任何片面說「不」的動作都彷彿自我否定，最終所可能推導出的，不但只有排外的本土主義，恐怕還是一種難以表達、虛無的主體，一段隻字不剩的歷史。此外，文中流露出的「孤臣孽子」意識足以使讀者想起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只是吳濁流的文筆強調流離的悲哀，而經歷過台灣經濟發展洗禮的柯瑞明則多了憤慨與激昂，但正如荆子馨對宋澤萊《台灣人的自我追尋》的分析所提醒的(2006:248)：悲憤的孤兒意識容易使「反抗霸權」成為唯一的政治行動邏輯，終至將台灣禁錮在「受害者」的主體位置上，反而被封鎖在排他性的認同中，阻斷任何顛覆的可能。不論從政策面或理論面評價之，《台灣可以說不》對於台灣認同政治的論述中能動性的開發並未重視。

總而言之，石原斷然說「不」的策略引起了中國與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仿效，但在愛國主義飆漲的中國與執政黨帶頭聯美制中的台灣，收到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不論向誰說「不」，石原與其效仿者都在召喚著一種排他性的本質認同，一系



列對何謂「中國性」、「日本性」乃至「台灣性」如鐵板般僵固的定義。而「說不」在台灣的缺乏回響，也隱約地說明了台灣在時間、空間上永遠與帝國體系牽扯不清的宿命。作為書市中曇花一現的商品，兩本書的商業意義也許更甚於文化與知識的意義，因此無法單就其暢銷與否來界定兩岸知識界的認同變化。相較於此，在戰後台灣的知識系譜中還存在著更多重想像中國與台灣自身的方法。透過對於戰後台灣政治論述的分析，將更利於掌握當代知識界在面對石原慎太郎的日本中心論述時，所可能有的情感衝擊或發言的假設，以下就透過對於戰後台灣知識史的回顧，梳理出當代台灣言論光譜上可見的「中國」認識，接著討論他們對於石原慎太郎的回應。



## 第二節、戰後台灣的知識氣候－從自由中國到民主台灣

較之現代日本以「中國」為參照點進行自我定位，夾纏在日本帝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後)殖民台灣更難以超越此結構限制，任何追求固定身份內涵的努力都必須不斷界定與日中的關係，方能思索台灣的出路<sup>47</sup>。然而相較於殖民統治半世紀之久的日本帝國，台灣社會對於中國既缺乏接觸，對其認識也就建立在更曖昧不真的基礎上，因此荊子馨形容皇民化時期的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祖國』認同只是一種「『幻想的(imaginary)』共同體」，說明其缺乏根深柢固的有機文化聯繫，而只是殖民壓迫情境下轉向祖國求助的渴望，以及反抗殖民的身份策略(2006:113)。經過皇民化時期的日本中心教育，台灣社會縱使在情感上仍對中國懷著抽象認同，對於現實中的中國卻極其陌生，也不由自主地以日本帝國的尺度來衡量中國<sup>48</sup>。此一斷裂在國共內戰結束國民黨政府遷台後，構成統治階級與

<sup>47</sup>如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顯示出林獻堂、蔣渭水、連溫卿等知識菁英在中/日兩種民族認同，以及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兩種價值系統之間複雜的思辯，而對於台灣的定位以及適合的發展方向，也在其間來回遊走。中日開戰後，蔡培火提出的〈東亞之子如斯想〉，更設想台灣能在敵對的中日兩國之間作為媒介，於是創造出一種遠較戰後國家中心敘事要更為開放的身份。可參見荊子馨2006:88；吳叡人2006；石之瑜、顏欣怡、王寶萱2006。

<sup>48</sup>因此當1947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終見得「祖國」軍隊模樣，所迎接的卻是一行行疲態百出的隊伍時，其失望之情也就難免。可參見徐宗懋1994,《日本情結》。

社會間的主要矛盾：台灣民眾從日本的現代化尺度來看國民黨政府，看到的是一群毫不令人尊敬的形同敗軍之將，反而懷念起日本統治的建設與紀律；而經歷過抗戰與南京屠城的國民黨人原本期待台灣人民能流露出仇日的情緒，卻要面對台灣社會中普遍的念舊之情，因此非但不能同情社會中普遍的親日傾向，也往往被勾起卑微苦難的歷史創痛 (石之瑜 1998:65)。緊接著對中國景仰的幻滅後，便是蔣介石政權的高壓統治，風聲鶴唳中，戰前百花齊放的殖民地解放論述在戰後被迫噤聲，由官方意識形態與流亡知識份子的對抗取而代之。

1950年代，台灣的知識舞台乃是由內地流亡來台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所主導。1949年《自由中國》的創辦，標誌著西化派知識份子的集結，包括雷震、張佛泉、殷海光等人，皆經歷過五四洗禮，並願意信奉英美自由主義所勾勒的社會發展圖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則多所懷疑。如殷海光嘗感嘆：「自由主義在中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又云：「在邏輯上，有壞而僵固的傳統倒不如沒有。因為有他固障，反礙吸收。……僅僅為延續傳統而延續傳統，其本身並無意義與價值。」從這幾段話中不難看出，對殷海光所領銜的自由主義者而言，中國文化傳統如果不利於國家現代化，便不需要保存；因此乃是有助於啓蒙工程的自由化、現代化為首要目標，次之討論中國傳統的價值。這套主張也導致了與新儒家學派的齟齬<sup>49</sup>，抨擊他們為了現代化而不顧道德理想，甚至認為殷海光所倡導的自由主義只是以極端個人主義思想遂行反國家、反社會的宣傳 (黎漢基 1995)。

儘管《自由中國》的創辦原是爲了在「一個中國」立場下支持「光復」中國大陸的正當性，隨著知識份子們對於自由民主的辯證愈趨細密，以及國際情勢使光復中國之目標愈趨渺茫<sup>50</sup>，《自由中國》的言論焦點也就從對於國家目的的肯定逐漸轉向對個人自由的辯護，終至提出「個人自由優先於國家自由」之主張，質疑起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合理性 (薛化元 1999)。對蔣介石政權的失望也鼓動知識份子

<sup>49</sup> 當時除了《自由中國》之外，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另創《民主評論》雜誌，探討儒家德治傳統與民主理想之間的兼容性，兩陣營在 1953 年後思想愈趨分歧，也令共同師承金岳霖的徐復觀與殷海光逐漸分道揚鑣。詳見黎漢基 1995。

<sup>50</sup> 指的是 1958 年第二次台海危機之後，美國逐漸放棄干預兩岸，使得台海情勢穩定化。

們發起更具體的實踐，終於在雷震籌組反對黨入獄後，迫使《自由中國》停刊<sup>51</sup>，也揭開了白色恐怖的序幕。

經歷了白色恐怖的沈寂之後，台灣退出了聯合國，國民黨的台灣主體論述又萌發新枝芽。國際社會立場的改變使「反攻大陸」的希望成泡影，國民黨於是透過引入本省籍菁英、民意代表增補選、公共建設投入等措施來樹立統治正當性。適逢，美國在越南戰敗，亞太政策面臨改弦更張之需，於是由中情局透過福特基金會創造出一個新的研究範疇，來扭轉失敗而成爲成功的一方。太平洋盆地 (Pacific Rim) 的提出，專事評價比較各國發展模式的優劣成敗除越南顯屬失敗之外，台灣則以可觀的經濟成長被列入新興工業化國家 (NICs) 之林，頓成爲「第三世界國家」中的經濟發展楷模。這可以視爲國民黨在台灣本土化論述的一個源起契機，也讓失去重心的官方論述與追求台灣獨立的體制外運動發生匯流的空間，因爲國民黨爲現勢的因應作爲已然走出「一個中國」的框架，而以自由世界一份子的姿態與中國分庭抗禮<sup>52</sup>。

90 年代李登輝繼位後推動的實質台獨路線，推動國民黨官方民族主義與黨外台獨運動的主張正式匯流。在這位具有日、美教育背景的政治菁英領導下，透過發動終止動員戡亂、廢省等憲法變革，終於完成國民黨自 70 年代開始的本土化工程，並收編了黨外台獨運動的論述主張<sup>53</sup>；至於五四以來對於「民主」的尋索也在 1996 年總統直選後獲得認可。若深入回溯這一系列世界觀的變遷軌跡，從「經濟發展」到「普選民主」，李登輝政府步步依循著冷戰體系下美國對「自由世界」的界定來鞏固其統治合法性，順其邏輯，原本是獨立運動不證自明之障礙的「中國」，從而也成爲普世價值下亟待感化的他者。這道視野上的匯通，爲本土化後

<sup>51</sup> 即著名的「雷震案」。

<sup>52</sup> 石之瑜 2001, pp.83 「原本台灣與大陸是在爭奪誰代表中國，這個戰役的勝負在台灣退出聯合國後就已決定了。雙方鬥爭的新意義是，誰的發展模式才是適合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楷模，台灣很明顯地就是代表美國觀點，最終歷史目標是以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爲號召的發展模式，而大陸的發展模式當然就是社會主義路線，或中央計畫的發展模式。」

<sup>53</sup> 最好的例子是：許信良指李登輝挾職權之便「竊取了」民進黨的改革主張。見許信良 1995, 《挑戰李登輝》 pp.68.

的國民黨和以台獨黨綱起家的反對運動創造了共同的敵人<sup>54</sup>，使得往後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政權交替格外融洽而順利<sup>55</sup>。

雖然，《自由中國》的批判精神，並未在民主化的潮浪中完全消解，不過其繼承已非以中國為主要的關切。隨著台灣的普選民主，戒嚴時代以黨國體制為抵抗對象、以推動大中國現代化為終極理想的民間自由主義論述，為因應台灣經驗受到美日輿論界的注意，開展另一套能藉由民主反華來迴避台獨的道德論述：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龍應台 2005)

<sup>54</sup>追究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歷程，「民主化」與「台灣獨立」看似是兩個不可能分割的目標，但兩種價值間並非全無矛盾。民進黨創黨初期受限於美麗島後的高壓氣氛，選擇以「住民自決」等較模糊的語言來掩飾台獨目標，並以民主訴求來吸引更廣泛的社會支持，但吸引「黨外」集結的真正動力仍是爭取政權的現實考量，也因此菁英之間對於「民主」及「台獨」間孰先孰後的選擇不乏辯論，雖然有部分新潮流成員致力於勞工運動、婦女運動等草根力量的耕耘，大部分的菁英仍深信台灣獨立目標的達成便足以化解社會中的各種不正義。這種掙扎在葉菊蘭針對鄭南榕自焚的發言可見一斑：「解讀鄭南榕的死，難免主觀的滲入，而鄭南榕就義的導火線是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是言論自由的問題，也自然是獨立建國的問題，加上其生前交遊無私，更形成身後不同立場不同朋友的不同詮釋，在『台獨建國烈士』和『為言論自由而死』之間倚輕倚重，但我不認為兩者是可以分開處理的。」(詳見陳佳宏 2006,《台灣獨立運動史》，第五章，〈台獨運動的匯聚〉。)可見在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中，「民主化」與「台灣獨立」之間確實存在著「目的」與「手段」的辯證關係。而在李登輝帶領國民黨完成「本土化」與「民主化」之後，最該問的問題並不是李登輝是否竊取了民進黨的改革主張，而是：在民主體制的政黨競爭下，本土化後的國民黨，和追求台灣獨立的民進黨之間，究竟還有甚麼不一樣？

<sup>55</sup>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憤怒的國民黨支持群眾包圍中央黨部久久不散，而李登輝卸任後也在公開場合遭到榮民以紅墨水攻擊，表示在一般民眾的想像中國國民黨和民進黨應該是對立的，代表兩種對立的意識型態與史觀，而李登輝不替本黨候選人連戰助選，卻暗助民進黨的陳水扁，對忠誠的政黨支持者而言是不可理解的。然而不但李登輝自身對此「政權的和平轉移」引以為傲，陳水扁也在就職演說中強調這個「歷史性的政黨輪替」不是個人或政黨的勝利，而是「人民的勝利、民主的勝利，因為我們在舉世注目的焦點中一起超越了恐懼、壓迫和威脅。」這些說法所預設的聽眾不僅僅是台灣選民，而是以美國不能不認可的「第三波民主」模範生姿態，向代表「恐懼、壓迫和威脅」的中國示威。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龍應台 2006)

龍應台在這兩篇表面預設中共領導人為讀者，其實更可以藉來防衛台獨批評她是統派的文章中，大力推銷台灣的民主成就，而貫穿其行文的基本邏輯即是現代/傳統、民主/極權、文明/野蠻、國家理性/個人自由的二元對立。面對這既困惑著戒嚴時代的流亡學者、也糾纏著近代日本知識份子的命題，她藉由義無反顧地選擇『文明』的姿態，比如要求她所情繫的家國朝向自由、民主價值進化，否則便不值得認同，如此而能在台灣獲更寬容的接受。龍應台慣常以雷震、殷海光異

議精神自比，但在這個意義上，她到底是繼承還只是消費《自由中國》的問題意識，是將台灣視為「復興基地」，期盼以之為楷模推動全中國的「現代化」呢？還是將台灣視為家園，不得不創造出某種反共以逃避台獨論者的攻詰？然而在她對台灣民主成就的頌揚中，台灣民主的成就彷彿完全是自然進化的結果，而忽略了族群紛爭、國際孤立在其背後推波助瀾的效應<sup>56</sup>，更無能批判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共謀關係。

故在戰後台灣的知識系譜中，存在著兩種自由主義的軌跡，兩種認識中國的方式：首先是官方政治菁英所主導的官方自由主義，以經濟發展為先爾後達成政治民主化，此路線以「反共保台」為前提，在國民黨進行本土化的過程中逐漸吸納台獨論述的視野或力量，而將中國視為獨立於台灣存在的另一個政治系統；另一套則是以「反攻大陸」為終極目標的民間自由主義論述，這系列觀點發軔於《自由中國》知識份子，期許以吸收西方思想幫助中國列入普遍主義文明大國之林；在當代，後者重現於自由派知識份子對於中國大陸極權的批判，肯定了台灣作為普遍主義模範生，因而外於中國的合理性，形同向官方靠攏。早期自由中國的知識份子是為了中國而談自由主義，當代自由主義論述則是為了自由而可以不談統獨，兩者所處時空差異因而造成的身份策略不同，說明何以反共與反華兩者之間由早期的對立轉而結盟。兩種自由主義都以中國為參照點，但官方將中國視為威脅，近似於福澤諭吉的惡鄰論；而民間將中國視為亟待感化的舊文明，期許中國能接納普遍主義，此情感則近似於丸山真男對於日本的評論，期許透過適當的「啓蒙」改造工程，日本也能晉身於符合啓蒙理想的文明國家

這些幽微的情感落差，在與堅毅不屈的日本國家主義者石原交會時，卻擦撞出迥異的火花。

<sup>56</sup> 在許多比較政治研究的作品中，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往往被視作現代化理論的異例。早期的研究困惑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早已超過「可能產生民主」的門檻，而1990年台灣民主化後，學界也傾向以地緣政治下的菁英選擇論來解釋。參見 Steven Hood, 1997,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Westview Press. Tseng and Haggard, 1992,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而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和《亞洲的智略》兩書中也有許多篇幅談及台灣「民主化」和「本土化」兩個目標之間互為表裡的關係，詳見《台灣的主張》第八章，〈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亞洲的智略》pp34-53，〈我為何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

### 第三節、向石原說「YES」？－台灣菁英與石原的交會

石原與台灣的交會，緣起於 1972 年日本田中角榮內閣與台灣政府斷交之際。1972 年 9 月，田中內閣與中共建交，台灣政府協商與日本以非正式組織進行外交活動，海工會主任馬樹禮於 1973 年 1 月赴東京成立「亞東關係協會」總攬對日工作。面對執政自民黨內派系林立的情狀，馬樹禮鎖定兩股力量為佈建對象：首先是曾在戰後蒙受蔣介石「以德報怨」外交恩澤而對台灣友好的元老政治家，包括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福田赳夫、灘尾弘吉等三十餘位；另外一批對象便是反對田中為號召的「青嵐會」成員，石原慎太郎即為箇中要角（馬樹禮 1997:145）。兩代議員組成「日華議員關係懇談會」，於 1973 年九月、十月兩度訪問台灣<sup>57</sup>，並在中日斷航的議題上與中華民國政府並肩作戰，杯葛田中及大平內閣，促成日中復航。曾在亞東關係協會工作多年的陳鵬仁便形容：在 70 年代艱困的外交處境中，青嵐會一直是「最替中華民國政府賣力的團體」（訪談記錄二）。由反共立場開啓與台灣的友誼後，石原與台灣政界的交往日漸深入，甚至在 1983 年央請台灣政府協助掩護摯友艾奎諾返抵菲律賓<sup>58</sup>，雙方情誼之深厚可見一斑。除了公務訪問外，石原也常以私人身份造訪台灣。1999 年當選東京都知事後，石原不但不顧北京的抗議，年年前來台灣造訪，也成為追求台灣獨立的民進黨政府亟欲拉攏的對象。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每逢訪問日本，必不會錯過與他會晤<sup>59</sup>。

雖然石原親台的立場自 70 年代便一貫鮮明，台灣政黨與媒體對於石原的態度卻並非全無矛盾。在問及如何看待石原慎太郎對於歷史的詮釋時，曾與馬樹禮共同在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工作的陳鵬仁便表示：「比較親我們的國會議員他

<sup>57</sup> 第一次來訪在中日斷交一週年的 1973 年 9 月 30 日，共 74 人；第二次則為同年 10 月 29 日，有七十多位議員組成「祝壽團」，前來祝賀前總統蔣介石八十八歲米壽。

<sup>58</sup> 在石原回憶錄對此過程中有詳盡的介紹。參見《國家的幻影》頁 367-382，〈馬可仕的陷阱〉。

<sup>59</sup> 台灣運輸機械公司董事長彭榮次形容：「台灣政治人物到日本，他一定見面。所以台灣的政治人物去日本，見不到首相，就見他。」

們這些人都是國家主義者，因為他們都是反共的，那反共的他們就是比較親我們的，尤其是在美國與蘇聯對立時，他們都是反共的，所以我們在日本工作有時候會有矛盾，因為他們都否認那個南京大屠殺，但是他們都支持我們。為什麼支持我們呢，因為他們反共……我們常常儘量避開講這種有爭端的事情，要談共通的利益，這樣才能合作嘛。你講那些釣魚台呀、南京大屠殺呀、那這樣子他們也不會讓步，我們也不會讓步嘛。」(訪談記錄二)可見「反共」的立場雖使雙方並肩作戰，但在國民黨正統意識形態下，石原與國民黨代表之間亦非水乳交融。

然而，隨著李登輝上任後「本土化」成爲台灣政治的主旋律，觀察者乃在李登輝的言論中發現愈來愈多與石原相呼應之處。1999年5月李登輝發表《台灣的主張》，當中對中國的看法多所呼應於石原——

「兼具霸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大中華主義，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仍然極具威脅性。俄羅斯或許沒有感受到中國大陸的壓力，但印度則因深感威脅而與中國大陸對峙。其他國家也都對中國大陸多少存有恐懼之心。倘此情形繼續存在，亞洲將永遠不會有安定之日。」

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1999:241)

以上即是著名的「七塊論」，批判中國擴張、預言中國崩潰、同時要求美日警覺，保衛台灣以保衛整個亞洲安全，其主張與石原1995年在《亞洲可以說No》的論調多所類似，也在石原日後的發言中不斷重複。1999年11月，石原又履行當選時的承諾以東京都知事身份前來台灣「瞭解」九二一地震的重建情形，這是台日自1972年斷交以來，日本首長以官方身份來訪台灣層級最高的一回，高調的舉



動不僅令日本外務省和中國外交部錯愕，也激起國內媒體矛盾的情緒。在熱忱歡迎的聲音中，以《台灣時報》的社論〈我們應以開闊與前瞻的格局歡迎石原訪台—統派人士不應與中國沆瀣一氣〉最為露骨：「石原此次訪台名義上是關心九二一震災，然而他的身份以及到訪時機卻牽動了台日中微妙的三角關係……石原此行不啻是石破天驚之舉，其後續效應相信是不容低估的。」(台灣時報 1999) 同樣對石原表達熱忱歡迎者還有《自由時報》社論〈歡迎石原來台關切地震災情〉：「在臺灣遭逢百年大地震災難之後，石原一接獲李總統的電話邀約，即刻決定來台訪問，不畏中國的打壓，頗有風雨故人來的情義，更令台灣人民感佩……在此『恐中』之風下，石原來訪更彌足珍貴。尤其，在少數國內政客詆毀李總統所領導的民主改革，否定台灣是一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與中國隔海唱和之際，石原卻公開稱讚李總統是其最欽佩的政治領袖。這對於目前在檯面上競爭的總統參選人而言，石原慎太郎縱為外人，但其對台灣政局觀察之深入，亦有可資借鏡之處。」(1999a) 隔日社論〈台日關係可望更上層樓〉則繼續引述石原慎太郎對於中國政權的批評，樂見台日聯合「對抗中國霸權主義的威脅」(1999b)。在距離 2000 年總統大選不到半年的緊張氣氛中，兩家本土色彩鮮明的報紙都借用石原慎太郎的立場來抨擊所謂的「統派媒體」或「統派政治人物」，並歷歷引用石原對於中國的批評，充分顯示李登輝總統拋出「兩國論」後，本土派媒體對於日本「中國威脅論」的照單全收。

光譜另一端的《中國時報》，則以專論點出了石原來訪挑起的愛憎翻騰：「石原本人是極右派的國家主義者，主張釣魚台屬於日本，反對日本為南京大屠殺道歉，這些話在中國人聽來十分刺耳。在另一方面，台灣的國際困境源自於中共打壓，石原訪台卻是對中共的一聲嘲諷。光是石原這個人來訪值不值得台灣人高興，就已經挺讓人矛盾的了，偏偏事情又是李登輝自己促成的……他與石原的接近，著實會令人感到不舒服。」(張慧英 1999) 這樣的態度具體表現在新黨政治人物的言行中。在石原訪台之際，新黨的總統候選人李敖以及立法委員李慶華都

在公開談話中嚴詞抨擊，前者指「『石原牌』是李登輝繼『兩國論』、『七塊論』、『夾擊論』後另一項激怒中共的牌」，同時呼籲台北市長馬英九勿與石原會晤，「要救災，應和大阪、神戶市長談；要談文化，和(文化局長)龍應台談就好了。如果他敢見石原慎太郎，我(李敖)和他沒完沒了。」(陳嘉宏 1999) 李慶華亦強調石原慎太郎在歷史認識上的極右翼立場，而指李登輝的邀訪是「有辱國格」，且「徒然造成兩岸緊張」(楊金嚴 1999)。11月15日，馬英九市長與石原慎太郎會談洽商兩城市文化交流之際，統派團體也在晶華酒店外舉牌抗議。

站在石原的立場而言，統派政治人物的抗議或許不值得意外，但當時對台獨仍發言反對的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的「贈書」舉動卻令石原念念不忘，甚至在回國後對著台灣媒體抱怨，表示她破壞了台北與東京的友情，奉勸馬英九市長要「好好管教」龍應台(自由時報 2000)。事出於 11月15日馬英九與石原慎太郎會談時，龍應台將著作《百年思索》贈送給石原慎太郎，並且將書中批判李登輝史觀的部份特別勾出來，給石原參考(楊金嚴 ibid)。究竟龍應台在書中說了甚麼導致石原不快呢？讓我們試著從這段文字裡追索：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裡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甚麼？……在侵略戰爭的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受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是否又能拋開情感糾纏，作客觀的評斷？」

(龍應台 1999:131)

雖然對李登輝的歷史詮釋有所批判，龍應台仍強調對歷史的觀感可以從一個客觀而中立的位置出發，而無關家國認同：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作為人類的一份子，希望看見和平的實現，而二十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中國與歷史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是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意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人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站在「哪國人」的立場，而是站在『人』的立場。」(Ibid:133)

這篇文章原本是給李登輝總統的公開信，標題定為〈你是否看見歷史裡的「人」——對李登輝史觀的公開質疑〉，以批判李登輝於1998年11月接受日本雜誌《諸君》專訪時的發言<sup>60</sup>將這本書贈送給石原，顯然意在向其表達作者自身對普遍人權的信仰，同時迂迴地抗議日本右翼對於戰爭責任的評價。之於石原，這樣的言論不可能不刺眼，然而龍應台所持的普遍人權論述卻又賦予她一個難以有效反駁的道德正確位置，於是石原只能以「她很討厭」「她破壞了兩個城市的感情」等等情緒性的語言表達不悅。

<sup>60</sup> 專訪中李登輝提及「五十年前的舊事沒有需要重提」，又指「江澤民的史觀可能更有問題」促成了龍應台寫作動機。

儘管存在著像龍應台與新黨這兩種批判石原的聲音，2000年之後隨著民進黨執政的「本土化」意識當道，媒體上石原慎太郎作為「台灣的友人」之形象愈益鮮明，反對石原的力道則趨於薄弱。最明顯的例子是此後石原訪台時不再遭遇到統派政治人物的圍剿，此外，執政黨政治人物也每每在訪日時拜會石原，並在各種外交議題上附和其意見<sup>61</sup>。甚至，國民黨籍的台北市長馬英九應對石原的態度，也成為忠誠檢查的對象<sup>62</sup>。除了這些直接圍繞著石原慎太郎的事件之外，2000年後包括小林善紀出版《台灣論》在台灣引起的軒然大波<sup>63</sup>，以及標榜急獨的台灣獨立團結聯盟至東京參拜靖國神社，都再再表明：向石原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史觀靠攏，在台灣政黨輪替後的政治氣氛中成為向中國表達抗拒、壯大獨立正當性的身份策略之一。



觀察台灣菁英對於石原的褒貶互錯，可以如何拓寬吾人對於台灣認同政治的理解呢？在此提出兩點分析：

首先，石原堅貞不渝的右翼反中立場，誘引著各種認同傾向者對其發表評論。討伐石原者可以採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因為石原的言論直接觸及近代中國

<sup>61</sup> 如2004年5月行政院長游錫堃與石原會晤時，建議日本政府在國籍登錄欄上區分台灣人與中國人，石原附和其意見同時批判中國蠻橫(自由時報20040520二版)；2005年3月中共制訂《反分裂法》之際，新聞局長林佳龍與台灣智庫代表赴日訪問，石原當面指「中國可能自己先分裂，台灣無須在乎只要做好防衛工作即可」(自由時報20050305二版)。而石原對於台灣的意義，從彭榮次的談話中可見一斑：「石原是舉足輕重的公眾人物又是政治家。東京都的GNP比加拿大還大掌握了東京，中央事務他沒辦法管，但形式的意義，日本的首都很親台灣，對台灣來說是實質的份量。」(20070514訪談記錄一)

<sup>62</sup> 見曾韋禎2006/07/10，「從石原慎太郎看馬英九」，自由廣場。文中舉1999年石原訪日期間與龍應台的齟齬為例，批評馬英九維護龍應台「無理又挑釁」的行為；另一例2005年北京退出亞太主要城市網會議時石原希望馬英九提前辦理。馬英九不依的發展，抨擊馬英九「非理性反日」而錯失讓台灣在國際上曝光的良機。<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jul/10/today-o2.htm>

<sup>63</sup> 2001年2月，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漢譯版在台上市，書中國策顧問許文龍與蔡昆燦兩人的「慰安婦自願說」引起譁然，長期從事慰安婦救援行動的婦援會召開記者會譴責，親民黨立委李慶華馮滄祥則分別有撕書、燒書的舉動，許多立委紛紛要求許、蔡兩人公開道歉，並將小林善紀列為不受欢迎人物。民進黨立委蔡同榮則呼籲婦權團體「一視同仁」地關心國軍八三一軍妓問題。事件最後以許文龍的書面道歉作結，但除了政治人物外，許多文化人、媒體工作者也都捲入了這場論爭，急於對各種「媚中」或「媚日」的史觀發表看法。相關的新聞分析及評論可見前衛出版社2001，《台灣論風暴》。

屈辱歷史的創傷內核，唯有極盡攻詰才能扳回尊嚴；也可以採用自由主義的立場，如龍應台，從而石原對於民主人權的雙重標準構成普遍主義信仰的例外，必得加以糾舉方能彰顯自由理念的高貴性(反之，任何暗示接納的沈默都將威脅普遍立場的整全性)；追求台灣獨立者要依附石原，因其對中國的反感提供了豐富的修辭資源，而外交上的支持更足堪鞏固反中堡壘，保證台灣的獨立性。

然而，何以同樣口口聲聲自豪於台灣民主化成就的政治菁英，與堅貞信仰自由民主人權的文人龍應台，在面對同樣聲稱支持民主價值、痛惡共產體制的石原慎太郎時，竟有如此判然的反應呢？此一落差正顯示出了自由主義在台灣乃至整個東亞的曖昧性——如果不是虛假性。「台灣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標？簡單來說，就是台灣的本土化『自由民主』是世界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何謂『自由』，在各個國家因為面對的環境不同，必定會有不同的解釋。就台灣的情況而言，長久來，台灣人民都無法擁有自己的政權，因此『自主』應該是台灣民主化所致力實現的目標。我在與已故的司馬遼太郎先生的對談中談到『出生地的悲哀』。多年來，台灣人民一直為外來政權所支配，直到我們逐步推動民主化，才使台灣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2000:35-36) 李登輝的這段表白說明了台灣的民主轉型幾乎盡是其個人意志的成果，目的在於透過本土化與民主化的工程築就台灣的獨立性，從而擺脫「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因此自由民主在台灣的成就顯然逕庭於西歐歷史經驗，並非來自自發性的公民社會所衍生的覺醒力量，而得力於政治菁英有意識的策略選擇。與「本土化」劃上等號後，「民主」成爲一個帶有對抗性的概念，成爲權力糾舉敵人的藉口，反而喪失了自由主義所追求的多元容忍。而在日本的脈絡中，戰後的立憲民主更是與本土社會的意識無關，是由美國強行套用的制度。儘管如此，由於美國霸權體系所賦予的價值優位性，日本與台灣還是成功地將自身包裝爲現代化發展的楷模，從而取得了睥睨中國的位置。有論者批評這套官方民族主義「承接了冷戰迄今一脈相承的『親美反共』世界觀，透過召喚對『共產黨』的恐懼和經濟發展的追求，使台灣、南韓與日本共同編入『自由世界』陣營，

從而封鎖對帝國主義有所質疑的可能性。(陳光興 2006:46) 然而，如果「自由民主」只是歷史偶然賦予日本、台灣的政治正確位置，「反共」的宣稱又何嘗可能是慎思明辨後的真誠選擇呢？衡諸上一章中石原對於中國無所不包的批判，「反共」的真實性恐怕遠遠不及歷史所賦予的「反華」意識。同樣的，在自由主義作為論述霸權的結構下，知識份子也得以透過對於自由人權理想的擁戴保留身份策略的彈性。當龍應台侃侃而談「中國大陸與台灣，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其衣櫃中的國族認同已昭然若揭。我們可以想像：對於真正立場堅定的台灣獨立追求者而言，絕不會因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而放棄對中國的批判，因為「台灣優於中國大陸」是必須盡一切力量捍衛的宣稱，是所有發言的前提與結論。而龍應台透過「價值認同」優先於「國家認同」的論述策略巧妙規避掉身份認同的強迫質詢，並且取得了對中國、對台灣當權者皆能有所批判的發言位置，但碰到石原這樣的強硬反中派，龍應台仍不能不就對立的史觀有所表態。

表面上看來，石原與李登輝都在追求著國家的「獨立」，透過排斥中國來壯大台灣與日本的封閉性認同，建構一個氣勢凜凜勇於「說不」的排他性主體；而相反的，龍應台則以文明代理人之姿向中國喊話，希望中國終究能接納西方文明的價值，好達成一百年前孫文以三民主義建立現代中國的理想。然而，在其看似背道而馳的情感歸向之上，共同驅策著這三位發言者的意識形態機器，難道不正是未竟的啓蒙計畫嗎？促使其異口同聲以自由主義者姿態博取發言正當性的，難道不是在被規定好的價值系統下，競相作為文明模範生的「優等生意識<sup>64</sup>」嗎？而儘管心中的「家國」不同，但其苦苦追逐的戀物對象，難道不是福澤諭吉期期

<sup>64</sup> 此處借用竹內好提出的「優等生文化」概念。在 1948 年寫作的〈何謂近代？—日本與中國〉中，竹內好比喻近代日本在面對歐洲時只一意成為歐洲標準下的優等生，在成功地達成器物現代化後，日本菁英甚至得意地以為亞洲諸國須接受其文化施捨，因此這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淵源。竹內好批評日本接受歐洲標準自我發展的意識只是一種從「外部」取得的主體性，缺乏任何抵抗意識，也就無法成為自我：「對於抵抗的放棄正是日本文化優秀性的表現。」詳見竹內好 2005:pp.200-208.

企及的文明國家嗎？

相對於總是自豪於日本政經發展的石原慎太郎，窮畢生之力研究魯迅之「抵抗」精神的竹內好，至死仍不放棄對日本現代化歷程的批判。在評論 1959 年間日本知識界狀況的文章〈近代的超克〉中，他嘗言「今天的日本，問題並不在於神話的支配，而在於沒能克服那個神話的虛假知性，並非『依靠自己力量』重振了旗鼓。現今『近代主義者』也好，『日本主義者』也好，已經合而為一，正額手相慶著『今日日本乃真的文明開化之日本』，『實在榮幸感激不已』。」(竹內好 2005:356) 竹內好一生最致力批判的，乃是凡事以仿效西方為策的近代日本始終無法發展出徹底的「主體性」，而衡諸當今台日菁英言必稱自由民主之態勢，竹內的憂慮猶未過時。



## 第五章 結語：愛「國」的限度？

從以上三章的討論中，至少可以發現三種石原慎太郎的面貌：首先是作為文學家的石原，他的崛起象徵著 50 年代日本走出戰爭陰影後的文化新氣象，包括對欲望滿足的追求、對個人自由的強調、對戰爭責任的輕處理和對歷史的斷裂詮釋等，都是石原與同輩戰後知識份子所共享的時代變化。但石原並不僅僅是時代結構所塑造的被動個體，他的才氣和富裕的生活經驗也促使他成為大眾文化的生產者，以文字和影像作品被大眾所認識、崇拜。及至日後從政，石原的作家身份仍是他重要的形象資產。而他以「守護自我」為圭臬的人生哲學則使他得以睥睨一切，在以模糊為藝術的日本政壇中成為直言不諱的異數。

第二種石原是作為愛國政治家的石原。他對於日本近代歷史以及國際地位的看法，深深鑲嵌在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憑藉「脫亞入歐」建立主體性的問題意識當中，透過批判美、中，冀能為日本塑造超然於兩者之間的大國地位。但石原在批判美國專橫的同時並未跳脫美國自由主義所設定的國力衡量指標，而只能強調日本和美國有同樣的軍事與科技潛能，因此當日本經濟衰退而中國崛起，感受到中國威脅日本地位的石原只好預言其崩潰，乃至拉攏美國共同抗衡中國。石原在美、中之間搖擺的態度，重現了大正末年知識份子在歐、亞之間往返思辨的模式，也顯示日本依偎在兩種文明之間築就主體性的艱難。這個難題經歷了二次大戰後憲政體制與世界觀的斷裂，依舊困惑著日本知識界。

總結石原的人生經驗與政治主張，可以追問：石原果真是個法西斯主義者嗎？在第二章中曾指出，青年石原對個人自由的絕對擁護和對共同體的懷疑、嘲諷，使他大相逕庭於三島由紀夫等人對於國家的歌頌，直到三島自殺後，石原對於「為國犧牲」方有較多浪漫化的動作。相較於他與法西斯主義的若即若離，自小優渥的成長經驗似乎使石原對於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抱持更加真切的信仰，因此不但在文學及電影作品中宣傳享樂與自由，在評價美國、中國與日本時，現代化、



資本主義化的程度亦是石原常運用的評價標準。從戰後日本流行文化成形、變遷的過程看來，將石原視為日本「美國化」過程的受益者並不為過，或許其個人經驗中與美式生活、文化的親近，反而在心理上形塑了某種矛盾的防禦感，讓成為政治家的石原更強調自己對日本的忠貞和對美國的不贊同。但這些否認的動作皆無法遮掩他對於美式自由主義的信奉，於是在對比之下，法西斯主義反而更像是一件戲服，當石原需要在政治家身分上有所表態時，便穿上它。

最後不可忘記的，還有在中國與台灣作為一種「反中」象徵被認識的石原。在日—中—台三邊錯綜的認同角力中，石原長期來鮮明的日本民族主義立場和對中國的挑釁，形成了各方都欲加以評論或挪用的現象。批判者有從中國民族主義出發的立場，也有從自由主義出發譴責其右翼史觀者；而親近石原者除了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外，也往往附和石原從自由主義立場對於中共的批判向中國說「不」，兩者都希望藉著抵抗中國證成其國族敘事的獨立性。這說明了中國作為「自由世界」的例外，使民族主義者可以援引自由主義的語言來批判中國，以儼然具有真理性的「反共」立場遮掩「反華」的立場，是以恰如法西斯主義之於石原，自由主義也成為兩岸民族主義者的華服，在西方觀眾面前上演一場追逐普遍價值的好戲；但不管是為了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彼此「說不」，都使得互動中的三邊無視於對方成為今日之所是的來時掙扎，甚至在國家中心的僵固身份意識上，遺忘了在西方勢力進入東洋之前，三者間曾經共享的歷史。

表面上看來，是追求台灣獨立的本土政治家借用了石原的影響力，在國族意識中一點一滴剔除中國的重要性；但反過來說，石原亦藉著與台灣的親近，塑造了有別於日本中央政府的強硬位置，於是發展出一套不需要闡釋日本傳統、也不需要歌詠天皇制的「日本獨立論」。回到第一章所提出的問題：「台灣與日本在錯過了第一波具有解殖動能的民族主義發展後，是否能夠在後殖民情境中對帝國的魅影進行更有批判性的回應？石原慎太郎的『『正常』國家』、台灣獨立主義者所追求的『『新興』民族』，是否可能走向一種有解放意義的論述？或者，

我們注定只能在敵我邏輯的餵養下吐絲結網？<sup>65</sup>」不管是石原慎太郎對於美、中的排拒，或是台灣各界以自由主義將中國他者化的敘事策略，都只呈現了世界觀的單一向度。在凡事以西方自由主義為普遍圭臬的認識下，「愛國」的台日菁英必須時時刻刻擔憂不夠「進步」，不夠「獨立」，不夠為國際所接納，不夠資格稱為「正常」國家，甚至連原應具有多元容忍理想的「民主」都動輒成為帶有對抗性的概念，在掌權者的操縱下淪為內外找尋敵人的藉口。然而，當不勝枚舉的非西方民族皆為了承認而鬥爭不斷，該被檢討的果真只有永遠「努力不夠」的民族們，而不是普遍主義的理想其實從來並非普遍嗎？當愛國信念的驅策導致政治菁英一再否認歷史、文化與地緣的親近性，透過抹寫共同體歷史來護衛愈益空洞單薄的「本土」，除了被動地接受愛國主義的灌輸，更應該質疑武斷的國界劃分，如何封鎖了個別行為者在真實生活中的能動性<sup>66</sup>。

從近代日本知識史的發展理路分析之，石原的保守主張完整地繼承了福澤諭吉以降右翼國家主義者的關懷，具體的內涵便是透過與中國切割、追求西方現代性對於文明大國的定義，來確證日本的主體性；而在國際場域中，他敢於挑釁中國的作法，不僅吸引了來自台灣的論述結盟者，也為其贏得超越地方政治首長的國際能見度。然而石原雖然勇於對美國的外交干預說「不」，卻無能反省美國發展主義所設定的價值階序，這使得石原的國家敘事疲於追求帝國主義價值所設定的軍事、經濟大國目標，並對於 90 年代後中國的崛起深覺焦慮。執著於西方自由主義對於國家主權和利益的設定，使得石原的日本與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的中國之間失去對話的空間；同樣地，在西方面前堅持主權歸屬、期許以大國姿態塗抹近代歷史創傷的衝動，也使反日的中國輿論主流在與台灣的協調中失去彈性。在台灣，一味強調政權「本土性」的後果，則使所有關於弱勢權利、社會正義、人權、教育、環境的實質政策辯論和草根社會力量的培育都在認同爭執的壓縮

<sup>65</sup> 見前文頁 13。

<sup>66</sup> 正如傅柯所提醒的：「地圖上的國界只是政治權力的領屬空間，而作為政治領屬空間的國界也不過就是地圖上的國界。」出自 Mark Cousins 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下趨於瘡啞，一但繞過各種關乎歷史、關乎國家主權定位與立場的論爭，關於各種草根議題的討論近乎空白——沒有「公民」而只有抽象、同質的「國民」的政治體，又將從何為「民主」培力呢？

除了義無反顧地「愛國」之外，當代日本知識份子對於日本的國家處境有著更多樣的反省。從溝口雄三的「作為方法的中國<sup>67</sup>」，到濱下武志的「海洋文化論<sup>68</sup>」，都在提倡以活生生的歷史經驗與更廣闊的地域、文化互動，來融解以國家為唯一單位的排他性認同；日裔歸化美籍的國際關係史家入江昭，則提倡將文化觀點帶入國際關係的研究，也使突破主權封鎖的國際關係實踐成為可能<sup>69</sup>。晚近的台灣知識界中，亦浮現了藉由重新探索「民主」及「和平」來為「統」或「獨」加添內容的努力<sup>70</sup>。當「國家」的意義由封閉的主權承載體敞開為有著記憶與掙扎的集體生活場域，當各執一詞的政治菁英願意暫緩軍事經濟的較量，分享在追趕西方典範過程中共有的苦痛與疑惑，「愛『國』」才可能由咄咄逼人的口號落實為多層次

<sup>67</sup> 溝口雄三 1999, pp.106:「目前為止，以中國為『目的』的中國學，是以世界為方法、而試圖探討中國的中國學。這是把中國推向世界、並使之復權的意圖下自然生起的中國學。為了踏入世界、爭取復權，就得以世界為目標，並以世界為基準而斟酌它的完成度或相異度。要言之，中國是在『世界』這個基準下受到計量；此故，這個世界只是做為基準而設定的世界，只是被設定為既定方法的世界。對中國而言，世界之所以是『方法』，是因為世界只是歐洲而已；反之亦然，因為世界只是歐洲，所以世界對中國而言得以構成『方法』。……所謂『以中國為方法的世界』者，是那種把中國視為構成性要素之一(換言之，也把歐洲視為構成要素之一)的多元性世界。」溝口反對日本漢學界以歐美進化史觀來閱讀中國歷史，因而或者「抹黑」中國(以戰前為流行)、或者尋求為中國「復權」使之納入「世界」史之普遍法則(戰後蔚為主流)的認識方法，他批判這種閱讀法是以作為世界的歐洲為單一方法測量中國，於是架空了中國的意義。他提倡捨棄被當成檢驗對象的中國，拋棄根據「世界」一元性地檢測亞洲，透過中國的真實歷史來觀察歐洲，於是能夠相對化日本、進一步相對化中國，並在此相對化的多元性原理上，拋棄單一標準的世界觀，創造出更豐富多元的世界相。

<sup>68</sup> 專研經濟史的濱下武志認為，在亞洲內部長期存在著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獨立朝貢貿易體系，因此亞洲的近代化是以對朝貢關係的內容來處理，而非西化的程度來取代。濱下用「海洋」與「網絡」等動態的概念來描繪亞洲諸國之間的關係，於是能找到超越西方社會科學預設的民族國家作為理解政治經濟關係的基礎，且西方之衝擊至多只是朝貢體系的某種外生因素，而非顛撲不破的準則。可參考濱下武志 2000、2004。

<sup>69</sup> 入江昭出生於 1934 年，1961 年取得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他除了提倡以文化觀點來研究中日關係和東亞近代史，也多次以多邊會談方式結集中、日、美三國的歷史學家，針對二次大戰的歷史各自陳述辯論，以在互動中捕抓歷史真相。可參考吳佑倫 2007。

<sup>70</sup> 可參見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 2007/06/23 論壇，「民主與和平的兩岸關係」，會中多位學者嘗試在「統」與「獨」之外加添「民主」與「和平」的論述層次，並透過比較「民主」、「和平」等語彙在中國與台灣歷史脈絡的不同意義，找尋對兩個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談判的新基點。這可以視為在亞洲脈絡中借用西方的語言來對話的努力，使自由主義不再祇是排他的普世價值、或是將中國他者化的工具，而冀望在藉由台灣經驗反省「民主」與「和平」之真諦的同時，也能找到理解中國社會的新基點。另外可參見簡錫堉，〈給我的獨派朋友的公開信—唯有和平才能真獨立〉，2007/07/11。

的公共實踐。

以有限的語文能力與歷史知識試圖貼近近代東亞知識份子在啓蒙計畫下的創傷及衝動，註定是有所疑慮的，此外雖然試圖將與石原慎太郎有關的各種評論皆納入本書的討論中，但以思想史與認同政治為主軸的分析角度也必然有所偏疏，比方說當代日本菁英、社會大眾對於石原政治主張的回應，便未能包含在本論文的討論中，這類討論將是未來關於日中關係、尤其是尋思和平文化培養的很好起點。最後，雖然已在論文的尾聲有所觸及，但在日台主流政治中單薄的批判語境下，如何對自由主義語境的滲透更徹底地反省，進而設想出能使中、日、台的民族主義者彼此理解交會的架構，將是未來繼續探索的課題。



## 參考文獻

### (一) 中文專書：

Moore-Gilbert, Bart. 2004, 《後殖民理論》, 彭淮棟譯, 台北：聯經。

Nathan John, 1987, 《夢幻武士－三島由紀夫傳》, 梁翠凌譯, 台北：社會大學出版社。

—2005, 《無約束的日本》, 周小進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子安宣邦, 2004, 《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 趙京華譯, 長春：吉林人民。

大江健三郎, 2002, 《為什麼孩子要上學》, 陳保朱譯, 台北：時報出版。

小森陽一, 2003, 《日本近代國語批判》, 陳多友譯,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天皇的玉音放送》, 陳多友譯, 上海：三聯。

王屏, 2004, 《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 北京商務印書館。

方孝謙, 2001, 《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 1895-1945》, 台北：巨流。

石原慎太郎, 1987, 《斯巴達教育》, 蘇錫淇譯, 台北：水牛出版社。

—1990, 《可以說No的日本》, 與盛田昭夫合著, 劉秀琴等譯, 台北：中央日報出版社。

—1992, 《日本堅決說不一戰後美日關係總結》, 與江藤淳合著, 北京軍事科學院譯&出版。

—2004, 《太陽的季節》, 蔡姿淳譯, 新店：尖端出版。

—2006, 《國家的幻影》, 劉崇稜譯, 台北：商務。

石之瑜, 1998, 《宋美齡與中國》, 台北：商智文化。

- 江冠明等，2001，《台灣論風暴》，台北：前衛。
- 竹內好，2005，《近代的超克》，孫歌譯，北京三聯。
-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2007，《和平獨立 vs. 民主統一兩岸關係論壇》論文集。
-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1996，《中國可以說不一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感情抉擇》，台北：人間。
- 1997，《中國還是能說不》，台北：人間。
- 呂耀東，2004，《冷戰後日本的總體保守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登輝，1999，《臺灣的主張》，台北：遠流。
- 2000，與中嶋嶺雄合著，楊明珠、駱文森譯，《亞洲的智略》，台北：遠流。
- 卓南生，2006，《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社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吳侑倫，2007，《必由之路？日本進入全球化的中國途徑：入江昭、大前研一與小室哲哉的論述》，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荆子馨，2006，《成爲“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鄭力軒譯，台北：麥田。
- 徐宗懋，1997，《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台北：天下文化。
- 孫政，2005，《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孫立祥，2005，《戰後日本右翼勢力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許信良，1995，《挑戰李登輝》，台北：新新聞出版。
- 許介麟，1991，《戰後日本的政治過程》，台北：黎明文化。
- 柯瑞明，1996，《臺灣可以說不》，台北：業強。
- 馬樹禮，1997，《使日十二年》，台北：聯經。

陳佳宏，2006，《台灣獨立運動史》，台北：玉山社。

陳光興，2006，《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

黃俊傑、蔡明田，1997，〈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人文學報》第16期，  
1997年12月。

溝口雄三，1999，《作為方法的中國》，林右崇譯，台北：國立編譯館。

劉紀蕙，2004，《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麥田。

謝志宇，2005，《20世紀日本文學史—以小說為中心》，浙江大學出版社。

龍應台，1999，《百年思索》，台北：時報。

—2005，〈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中國時報 2005/05/25

A13版

—2006，〈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中國時報

2006/01/26

濱下武志，2000，《亞洲價值、秩序與中國的未來——後國家時代之亞洲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

## (二)中文論文

Pieterse, Jan Nederveen and Parekh, Bhikhu, 1997，〈意象的解殖——「解殖」，「自  
內解殖」和「後殖民情狀」〉，吳江波譯，收錄於許寶強、羅永生編(2004)，《解殖  
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山室信一，2004，〈面向未來的回憶—他者認識和創建的視角〉，《中國與日本的  
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編，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

石之瑜，2003，〈台灣本土論述的當代緣起〉，《展望與探索》第一卷第四期，  
pp.73-84。

- 2006，與顏欣怡、王寶萱合著，〈作為東亞的台灣—從殖民地收編國家？〉，《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十八期，pp.61-92。
- 2007，與曾倚萃、李圭之合著，〈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刊 163 期。
- 吉見俊哉 (Yoshimi Shunya)，(2002)，〈欲望/忘卻「美國」的日本戰後——「基地」與「消費文化」的錯綜關係〉，李文茹譯，《中外文學》31 卷第 7 期，2002 年 12 月。
- 吳叡人，2006，〈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統治下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新史學》17 卷第 2 期，pp127-218.
- 岩淵功一，1994，〈共犯的異國情調——日本與它的他者〉，林海容等譯，收於許寶強、羅永生編 (2004)，《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查道炯，(2003)，〈「正常國家」與冷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的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25 期，pp.1-29
- 黎漢基，1999，〈難為知己難為敵：略論徐復觀與殷海光的關係〉，《當代》141 期，pp.46-59。
- 薛化元，1999，〈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互動的一個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為中心〉，《當代》141 期，pp.32-45。
- 溝口雄三，2000，〈戰爭與革命之於日本人〉，《讀書》，2000 年 03 期，頁 8—11。
- 2001，〈創造日中間的共同知識空間〉，《讀書》，2001 年 05 期，頁 3-11。
- 濱下武志，2004，〈全球化中的東亞地緣文化〉，收於《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三)中文報紙及網路報導
- 人民網，2007，〈日本頭號反華份子—石原慎太郎〉，1 月 12 日。



[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1/12/content\\_7644506.htm](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1/12/content_7644506.htm)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5，〈王岐山晤日本三縣知事 譴責石原慎太郎〉，11月4日

—2006/07/17，「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詆毀法語吃上官司」

<http://news.beelink.com.cn/20050717/1887832.shtml>

田思宜，2001，〈東京公立殘障學校採用新歷史教科書 大江健三郎痛批〉，8月9日，聯合報5版。

台灣時報，1999，〈我們應以開闊前瞻的格局歡迎石原訪台〉，11月15日，2版。

自由時報，1999a，〈歡迎石原慎太郎來台關切地震災情〉，11月14日3版。

—1999b，〈台日關係可望更上層樓〉，11月15日，3版。

—2000，〈石原訪台暗指她很討厭〉，2月1日，5版。

陳世昌，1990，〈接受『花花公子』訪問 日本下屆首相人選石原慎太郎：『南京大屠殺，中國人編造的』〉，9月8日，聯合報，6版。

—1999a，〈東京都知事參選人石原慎太郎：『如當選，可能邀李總統訪日』〉，3月24日，聯合報13版。

—1999b，〈石原親台北遠北京〉，4月15日，聯合報13版。

—2000a，〈日議員將籌組委員會邀訪李總統 北京重申堅決反對立場〉，3月8日，聯合報A14版。

—2000b，〈北京與日本外務省強大壓力下 達賴抵日訪問 不與石原會面〉，4月14日，聯合報A14版

—2005，〈反中升溫 石原慎太郎力促釣魚台駐軍〉，5月3日，聯合報A14版。

泉州網，2005，〈抗議台爭主辦權 北京退出亞洲主要都市網〉，9月3日，

[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5-09/03/content\\_1785421.htm](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5-09/03/content_1785421.htm)

秦鴻志，1999，〈李敖：保釣健將何苦賠上政治前途〉，11月16日，聯合報3版。

張慧英，1999，〈石原賑災之旅，攪動國人複雜情緒〉，11月14日，中國時報3版。

黃菁菁，2007，〈石原新片引爭議 神風特攻隊英勇赴死？美麗誤解〉，3月1日中國時報14版。

陳嘉宏，1999，〈邀石原來台，新黨痛批有辱國格〉，11月14日，中國時報三版。

楊金嚴，1999，〈首都市長會談，敲定藝術家交流〉，11月16日，聯合報3版。

新華社 2005，〈石原慎太郎登沖之鳥礁〉，5月25日，<http://news.sina.com.cn/w/2005-05-25/12226744932.shtm>

曾韋禎，2006，〈從石原慎太郎看馬英九〉，7月10日，自由時報言論廣場。

董更生，2001，〈日右派與反戰示威者，大打出手〉，8月16日，聯合報11版。

簡錫堦，2007，〈給獨派朋友的公開信—唯有和平，才能真獨立〉，7月11日，自由時報。

聯合報，1973a，〈日自民黨年輕議員以組成青嵐會 敵血爲盟誓與共黨作戰〉，7月19日，四版

—1973b，〈日本『青嵐會』會員採取明確反共行動〉，7月21日，四版。

### (三) 英文專書及論文

Asada, Akira, 2000, "A Left Within the Place of Nothingsness", *New Left Review* Sep-Oct 2000.

Ahmad, Eqbal, 1991, "Racism and the State: The Coming Crisis of US-Japanese Relations." *Boundary 2* 18:3, pp.20-28.

Chatterjee, Petha,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ower, John, 1993, "Japan In War & Peace: Selected Essays", The New York Press
- 1993, "Peace and Democracy in Two Systems: External Policy and Internal Conflict" in Gordon, Andrew (ed.) 1993,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ant, Richard & Nijman, Jan, 1997, "Historical Changes in U.S and Japanese Foreign Aid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87 No.1 (March 1997), pp.32-51
- Inoue, Tatsuo. 1999 "Liberal Democracy and Asian Orientalism", from Bauer, Joanne and Bell, Daniel (ed.), 1999,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7-59.
- Ishihara, Shintaro. 1975, "A Japan Without Morality." *The Japan Interpreter* 1975 Winter, pp.276-291
- 1989, "A Japan That Can Say No: why Japan will be first among equals", NY Simon & Schuster
  - 1995, with Mahathir Mohamad, "The Voice of Asia"
- Ivy, Marylyn, 1995, "Discourses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Chicago Press.
- Nathan, John. 2001, "Tokyo Story: A Profile of Shintaro Ishihara." *The New Yorker*, April. 9 2001.
- Myers, Ramon and Peattie (ed), 1984,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kai, Naoki 1997,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herif, Ann, 2005, “The Aesthetics of Speed and the illogicality of Politics: Ishihara Shintaro’s Literary Debut.” Japan Forum Vol 17 No.2, pp.185-211.

Shih, Chiyu. 2003. “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Singh, Bhubindar, 2002, “ASEAN’s Perception of Jap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Asian Survey, Vol.42, No.2, pp.276-296

Yasutomo, Dennis T, 1989, “Why Aid? Japan as an ‘Aid Great Power’”, *Pacific Affairs*, Vol.62, No.4, pp.490-503

Tanaka, Steven, 1993,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u, Rei-Ren. 2002, “The Formosan Ideology”, PhD Thesis at Chicago University

(四)日文論文：

石原慎太郎、三島由紀夫，1969 (昭和44年11月)〈應該守護的價值〉，《三島由紀夫全集》第39卷 (東京新潮社2000)，pp.537-556.

石原慎太郎，2003，〈昔遣唐使，今不法入國者〉，<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14.html>

—2005，〈沖ノ鳥島の戰略的意味〉

<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36.html>

—2006a，〈自由台灣的存在意義〉

<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21.html>

—2006b，〈日本よ,再び〉，產經新聞社。

(五)人物訪談紀錄

項目	姓名	身份	時間	地點
一、	彭榮次	台灣機械運輸公司	2007/05/14	彭董事長辦公室

		董事長		
二、	陳鵬仁	文化大學日語系主任； 前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僑務組組長	2007/05/15	陳教授辦公室



※ 附錄：石原慎太郎年表

時間	石原生平大事	日本或國際政治大事
1932	石原出生	日本帝國侵略全亞洲
1945	就讀中學。「戰爭中，他們教育我們為天皇而死是光榮的，可接下來我所知道的全是民主、懺悔、和美國相處等等。大人們顯得既膚淺又虛偽。」	日本戰敗投降
1955	就讀大學。小說《太陽的季節》獲得芥川賞大獎。	舊金山媾和、美軍撤出日本
1960	為文批判參與群眾	安保運動
1968	當選參議員。主張：反共、維持日美同盟、不放棄發展原子能源	越戰結束
1973	成立「青嵐會」	日中建交
1989	出版《可以說 No 的日本》在日本暢銷	蘇聯瓦解，冷戰結束
1990	《可以說 No》的日本英譯版問世，前往美國宣傳訪問。	波斯灣戰爭爆發，日本投入可觀金錢援助
1995	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合著《亞洲可以說 No》；在國會議員 25 年表揚演說中突然宣布辭職	二戰終戰五十週年，首相村山富市發表談話向亞洲各國道歉；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1999	高票當選東京都知事；訪問台灣	日本通過「周邊事態法」、「防衛指針法」等提高自衛隊活動能力的法律
2000	發起主辦「亞洲主要都市網」	扶桑社《新歷史教科書》申請檢定，引起民間團體抗議
2003	第一次連任東京都知事，得票 308 萬為史上最高	
2007	第二次連任東京都知事	